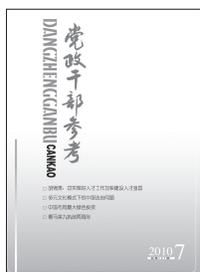


党政干部参考



主管 中共中央党校
主办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
协办单位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总编辑 / 社长 陈高桐
常务副总编辑 周 慧
副总编辑 张 莹
副社长 武志国
编辑部主任 史小平
本期责编 史小平
封面设计 关小雷
设计制作 崔金杰
责任校对 苏彰秦
封面题字 权希军

编辑出版 《党政干部参考》杂志社
杂志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中共中央党校综合楼
邮编 100091
电话 (010) 62805451
传真 (010) 62808900
E-mail dzgbwz@sina.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5922/C
国内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2-490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 0301 号
印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价 6.00 元

要论

3 胡锦涛：切实做好人才工作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学习与研究

4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
——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
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6 多元文化模式下的中国法治问题 / 衣俊卿

9 中国软实力建设：从理论走向实践 / 李智

高层言论

10 李长春：母校九十华诞感怀

11 李源潮：领导机关的干部要从基层来要到
基层去

农业·农村·农民

12 现代农业的困惑 / 曹东勃

14 “脱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困境
／符平 唐有财

15 相关链接：日本花 20 年完成“农民工”转型

16 外资进入农产品行业是把双刃剑

反腐倡廉

17 贪官“潜伏期”为何越来越长
／杜治洲 任建明

18 中国式腐败的六大传统观念 / 杨曾宪

经济纵横

20 经济指标体系如何揭示“真实” / 高帆

21 2010 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22 审视经济数字多个侧面 / 李开发

23 产权、激励与收入 / 金志奇

为政之道

- 24 27位部长的成功之道 / 胡骏
26 向中南海进言的中国智囊 / 张文祥
27 “地板干部”的烦恼 / 刘新圣

热点聚焦

- 28 专家解读人才发展纲要亮点
30 建设人才强国：一个举世瞩目的战略目标
30 人才就在我们身边
32 愿处长们争做教授 / 汪强

文化教育

- 33 城市文脉能延续吗 / 葛剑雄
34 中国文化产业“家底”大盘点
35 院士揭论文流失“潜规则”

环境保护

- 36 中国布局最大绿色投资 / 王仁贵 杨士龙

人物春秋

- 38 毛泽东点评历代名相 / 杨天宇
40 周恩来怒批部长 / 佚名

军事天地

- 42 中国军队要学会打“全球战争” / 韩旭东
43 周边海军加快巨舰建造步伐

海峡两岸

- 44 看马英九执政两周年 / 徐青

环球瞭望

- 46 瑞典纪行：“创新之国”源头探秘 / 余瀛波
48 美国大学靠什么保障教学质量 / 赵琳

最新书摘

- 49 人口素质是国家强盛、繁荣的决定因素

百家言

- 51 干部讲话应有“百姓思维” / 简满屯

- 51 莫把晦涩当高深 / 李醒民
52 领导讲话要培养“没有准备”的功夫 / 赵华

科技视野

- 53 人类离火星还有多远 / 吴戈

健康之友

- 54 中医调理知多少 / 赖文志

信息窗

- 55 中国国土空间将划分四大功能区域
56 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取决于国内情况
56 我国2020年前将规模化开发核能、水能、风能
56 卫生部拟出台“营养管理办法”
 严禁错误营养信息欺骗公众

数据库

- 封三 各省已公布援疆资金
封三 海有多深 洋有多大？ / 王菁
封三 全球和平指数新西兰第一 / 纪双城
封三 中国的10大原油来源国 / 马妍

撷英咀华

- 封二 风景 / 丁飞龙
封底 《党政干部参考》征订广告

如有破损、漏页、模糊、影响阅读的，请与本刊编辑部申继红联系调换

特别提醒：本刊登载的署有作者姓名的文章或文摘均有报酬，请作者与本刊编辑部联系或直接与北京市版权局稿酬收转中心联系。

地址：北京朝阳区和平街11区甲24号
邮编：100013
电话：(010) 84251823

胡锦涛：

切实做好人才工作 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切实做好人才工作，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是确立我国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支撑。全党全国要统一思想，真抓实干，全面落实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各项战略任务，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进一步开创我国人才事业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保证。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人才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培养和集聚了宏大人才队伍。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人才资源大国，各类人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同时，当前我国人才发展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

胡锦涛强调，做好新形势下人才工作，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更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扩大对外开放，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以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为重点

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坚强人才保证和广泛智力支持。

胡锦涛强调，到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总体目标是：培养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人才基础。我们要围绕这个总体目标，坚定不移走人才强国之路，科学规划，深化改革，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努力实现人才资源总量稳步增长、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人才素质大幅度提高、结构进一步优化，人才竞争比较优势明显增强、竞争力不断提升，人才使用效能明显提高、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逐步实现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转变。

胡锦涛指出，切实做好人才工作，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加强和改进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自觉用科学理论指导人才工作、用科学制度保障人才工作、用科学方法推进人才工作，不断提高人才工作水平。各级党委要把人才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善于用战略思维、开放视野、发展观点谋划和推动人才工作，落实人才培养使用重大政策，抓好重大人才工程，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发展，履行好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的职责，深入研究人才工作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使人才工作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抓好人才服务各项工作，努力为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持用事业聚才育才，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要鼓励创新、爱护创新，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要关心人才学习和生活，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要通过大力表彰和广泛宣传优秀人才的先进事迹，营造尊重科学、鼓励创新、甘于奉献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见贤思齐、奋发努力的良好风尚。

（摘自2010年5月27日〈人民网〉）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大课题

——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对于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意识形态领域将长期面临各种思想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在中国社会有着深厚的基础和根深蒂固的影响。它不仅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渗透到人们观念意识的底层和深处。

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随之也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社会进行全面改革，必然对一切陈旧的思想观念产生冲击，同时也会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大的转变。但是，变化了的思想观念未必都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相互交织，进步的观念与落后的观念也相互影响。各种历史的文化垃圾往往会在这个时期以回归传统的面目出现，各种陈腐的思想也往往打着继承遗产的招牌死灰复燃。对此，怎样继承传统，怎样除旧布新，使一切肯定与否定、提倡与抵制都能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着重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也进入了一个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冲击、相互影响的大环境。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和社会思潮不断涌入我国，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影响，

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积极的一面说，其有益的思想观念可以帮助人们开阔眼界，更新观念；从消极的一面讲，有些腐朽的思想观念、颓废的文化意识，会渗透到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严重的误导。而采取有效的措施与方法，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扩散与影响，提高社会成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鉴别力和免疫力，无疑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

必须注重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侵蚀

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是在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有的反映在传统文化里，有的遗留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也有的体现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其基本内容和主要表现是多方面的。比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当官要为民作主”的人治思想；“别尊卑，明贵贱”的社会礼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观念；“父尊子显、夫荣妻贵”的宗法观念；等等。这些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依然有较大的影响，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特别是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和某些时候还比较严重。比如，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以官为尊、唯上是从的“官本位”意识；漠视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和做派；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个人专断的家长制作风；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恶劣行径；任人唯亲、论资排辈、攀龙附凤的不良倾向；打击报复、欺上瞒下的衙门作风；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现象；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画地为牢的小农意识，还有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的泛滥；等等。

这些现象，多少带有封建主义色彩，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影响的反映。因此，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最有危害性的东西，是产生消极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

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划清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它在近代中国有过制度基础，并同封建主义腐朽文化融汇在了一起。在当代中国，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更多地是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而渗透到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并对我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不良影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集中表现为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所谓拜金主义，就是把获取金钱看成是生活最高原则的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认为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就可以支配一切，就获得了人的一切尊严。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存在的“一切向钱看”思想，就是这种价值观的直接表现。拜金主义对人们的思想道德产生着严重的危害，如果它渗入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后果则更为严重。所谓利己主义，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以个人的幸福为最终目的，并以这一切作为衡量善恶的最高价值尺度。利己主义在处理个人同社会、个人同他人的关系时，只关注自身利益，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正是利己主义的极端表现。利己主义左右人们的行为，其结果必然是为了个人私利，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甚至出卖国家的利益。所谓享乐主义，就是把享乐奉为人生唯一追求的价值观念。它是对人的自然本性、欲望、感官追求的无限放纵，可以表现为单纯的物欲实现，或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或感官刺激的追求。享乐主义不仅会导致人的精神空虚和内心麻木，造成个人行为的堕落，还会带来社会风气的败坏，以及衍生出多种社会病及社会丑恶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屡禁不止的“黄、赌、毒”现象，就与享乐主义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一旦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盛行，人们的信仰就会迷失、价值观念就会混乱。因此，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中，我们必须十分注意这一问题。

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封建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沉渣泛起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滋长蔓延及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低估。这些腐朽思想文化，不仅摧残着人们的心灵，污染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还将会引发各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健康发展。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是不容放松的重要任务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引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才能从根本上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侵蚀。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不仅对社会发展起着思想保障和精神支撑的作用，它自身的繁荣也是衡量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主导的观念形态，主要包括引领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价值目标、道德规范、民族精神等内容。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性工程。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社会的急剧变革和竞争加剧，难免会带来人们的思想波动和心理紧张；社会意识领域存在的某些非理性思潮，也会对人们的观念意识产生一些误导。因此，加强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创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不仅有助于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而且有助于人们摆脱思想上的困惑，找到精神上的支撑、情感上的归属、心灵上的寄托。在当今时代，思想文化已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大国，必须要高扬自己的思想旗帜，塑造自己的文化形象，形成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国际地位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优势。中国的发展越是与世界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就越有必要加强自身的思想文化建设。不断强化自己的思想力量和文化优势，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立于不败之

多元文化模式下的中国法治问题

衣俊卿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背后都存在特定文化模式的影响。

一、文化和文化模式

现在讲文化的人很多，可文化的内涵及外延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文化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具体的艺术作品，比如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绘画作品等等；第二个层次，是精神层面的文化，比如社会的主导型价值、社会文化心理、精神形态等等；第三个层次，是作为社会经济政治各领域内在制约力和驱动力的文化，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模式。

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一些文化学家和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各种文化的总体特征。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提出，我们研究文化不能停留在具体的文化特质和文化现象，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各种文化特质倾向于整合成一个首尾一致的文化模式。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需要根据日本的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本尼迪克特在1944年受命于美国政府，收集各项资料，采访了大量的日本人，写成此书。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家

地，才能使我们的人民以更加自尊、自信和自强的姿态面向未来，走向世界。

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也离不开对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的学习与借鉴。传统思想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丰厚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蕴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追求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和谐相处、爱好和平的思想和精神，但也反映着一些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与观念。在建设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过程中，我们需要承接和弘扬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也必须注意剔除其糟粕和有害的内容。

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在书中，作者提出两种文化模式，一种是西方人的罪恶感文化模式，另一种是日本人的耻辱感文化模式。

西方的理性文化源自古希腊，后来在古罗马时代逐步基督教化。基督教讲求的是人的原罪，源自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西方有着深厚的影响，形成了人对自己的过错要进行理性反省和内心忏悔的文化心理。而日本人更多的不是考虑自己行为的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注重面子，考虑是否丢脸的问题。日本人认为做了错事并不需要忏悔，但是让别人发现了则太丢脸了。

我可以举个明显的例子来说明罪感文化模式和耻感文化模式的差别。在对二战反思这个问题上，日本迟迟不肯悔过，而德国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从政府要员到平民百姓不断反思和忏悔，这就是文化影响态度的例证。截然不同的态度，背后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心理在起作用。

说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我还要提到一个人——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曾提出过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他认为，以公元前五百年为中心——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西方（即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等地）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

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在思想文化发展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都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过不同的贡献。就西方思想文化来说，其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所体现的一些思想观点，有许多是合理的因素、独到的见解，应当积极借鉴。但是，其主导思想与核心价值同我们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学习借鉴西方思想文化过程中，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梳理，绝不能忽视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与抵制。

（摘自2010年6月4日《光明日报》）

但是雅斯贝尔斯强调,虽说人类几种主要文化精神都起源于“轴心时期”,但是,东西方的文化特征是不一样的,西方理性文化强调改变、超越和创新,中国文化讲究中庸之道,什么事都要做得恰到好处,过犹不及。西方的理性文化强调平等自由的契约观,重视个体的发展,而中国强调经验,强调人情,注重整体而不太注重个人,强调等级而不太注重个人之间的平等。

二、西方文化模式的演变分析

西方的理性文化模式从一开始就以追求理性知识为宗旨。

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是以理性和科学知识为基础,体现着理性精神、契约精神、人本精神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贯穿于人的一切活动之中,体现在一切社会领域之中。这一文化模式把人的生存基础对自然的依赖转变为对人的理性和创造性的依赖,它在很长的时间内是工业文明的重要推动力量或依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文明成果。现代政治运动、现代社会管理等社会活动越来越依赖于理性、契约和法治的运作机制,越来越成为展现人的理性精神和自由创造性的领域。

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一直到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使现代社会的生产、经营、市场交换越来越体现出自身的理性内涵和科学技术含量。现代科学思维和技术理性强调以不断更新的现代知识和信息作为行为决策的依据,强调行为目标的合理性和行为过程及行为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可精确计算性。

在技术理性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人们形成了对科学的迷信和崇拜。那时的人们相信,人不如鸟会在天上飞,但是人能造飞机;人不如鱼会在水中游,但是人可以造轮船和舰艇。凭借理性和技术,人可以征服自然,人类可以在地球上建造一个人类的乐园,消除一切疾病和贫困,人们也相信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但是,西方这种模式在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现代性的贫困。对于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并未完全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并把人带入完善

完满的自由王国和人间乐园,相反,它在一定条件下导致了生态的恶化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等异化力量对人的束缚和统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人的未来应该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在机械工业化时代,刻板机械的工作和社会运行的高度规则化、机械化却压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所以,到了20世纪,很多哲学家都批判现代性,批判理性。很多文学艺术家也以艺术的形式想象和展示了高度理性化的社会和人类的可怕前景。毕加索的名作《格尔尼卡》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技术对人的异化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背景的战争的残暴;玛丽·雪莱的科幻小说《弗兰克斯坦》描述了科学家制造的机器人变成“技术恶魔”的可怕景象。

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在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三、中国文化模式特征分析

中国文化模式有什么特点?曾经有一首电视歌曲:“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前边有车,后面有辙。春夏秋冬忙忙活活,急急匆匆赶路搭车,一路上的好景色没仔细琢磨,回到家里还照样推碾子拉磨。闭上眼睛就睡,张开嘴巴就喝,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人们的每一天都是这样过,不需要自觉的思考,只是经验告诉你必须这么做。

所以,传统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什么最重要?传统、习惯、常识经验。这种经验模式强调习惯,而不是自觉的理性。乡土社会里,绝大多数人都是终生地在这个地方,生于斯,长于斯。中国传统讲的“国家”最初并不是来自于一种自觉的理性建构,而是一种自在的共同体,国即是家的放大,家国同构,皇帝就是最大的家长。我们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不是按照理性的原则,基本上是按礼俗、习惯和家规来对社会进行管理。

在这样的传统上,中国古代产生了儒家道家。古希腊的人研究数学、几何、天文等等,而中国的儒道关注人伦,研究与人打交道的方式。比如孔子讲的教化就是让人们懂得礼数。世界上中国人的礼数最多,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家的核心人际观念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是什么关系?其实是父子关系。所以君

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夫妻呢，也不是夫妻恩爱，而是有尊卑的。表面上看，我们确实构造了一个很不完满的社会，但这一开始就不是基于平等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天然的、血缘的不平等的关系或等级关系用礼俗、经验的方式固定下来。因此，传统的中国文化模式是一种经验文化模式和人伦文化模式。

这种经验文化模式对我们的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理论等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在经验、归类、人情、观点等方面。这种影响是非常大的。这种经验文化模式的核心是什么？两个要素，经验和人情。不仅影响人的行为方式，还影响社会经济的运行。

当然，在当今的中国，文化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对传统经验文化模式的冲击，使文化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已经开始慢慢地转型了。比如市场经济，是靠契约，而不是靠经验。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带来了思想的启蒙，人们的个体意识、独立意识觉醒，社会文化生活的多元化让人们走出封闭的小圈子，生活被改变，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化模式。

但是，改变到了什么程度？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是一种混合的文化模式。我们的传统文化模式很顽固，现在，以经验对抗理性、以人情对抗法律的情况很常见。

一是以经验对抗理性，经验式的文化模式至今还强有力地影响着民众，渗透到行政管理、经济决策等各个层面的社会活动中，比如在城市规划中，经常遵从的是长官意志，随意改变。

二是以人情对抗法治和契约，这种人情式的交往模式作为传统文化的遗产至今还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交往行动，影响着社会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健康发展。儿童择校、学生高考、工作就业、求医看病……人情无处不在。有的事情，表面上看是公事公办，其实底下还是人情。我把这叫作伪现代主义，看着很现代化很理性化，其实还是经验主义和人情化。

四、文化模式对法治的深层影响

最后讲讲我对文化模式的法治影响的理解。

首先一个判断是，不同的文化模式对社会、对

人的法治观念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对实体法、程序法的理解，不同的文化模式下是不一样的。我们传统上对程序法不太重视，而更重视结果。

我个人认为，发展完善的法治必须建立在充分发展的理性文化的基础上，根本意义上的法治，是理性的法治。我们研究法治史，有人说先秦的法家是法治，我不同意，我认为先秦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是以刑和暴力为重点的政治统治，而真正的“法”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

严格说来，我们中国公民还没有这种敬畏法律的文化。还有一大批人不懂法，不信法，这很可怕。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今，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对法治影响的问题很复杂。传统农业的经验文化模式已经进入转型期，所以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典型的传统经验文化，但又不是彻底的理性文化，是一个混合型的多元化的文化模式。在法治层面，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但另一方面无论在立法还是在执法上都还存在着矛盾、问题。

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我认为，中国目前的这种多元文化模式存在着很多积极性，比如它对国家社会资源的高效调度。从去年的金融危机、汶川地震到今年的玉树地震，能大量地调度资源；在司法方面，也可以调动资源，加大执法力度。我们的传统经验文化，也可以用于社会调节、舆论调节等，用于化解社会矛盾，多渠道地解决社会纠纷问题。当然，也有消极效果。比如紧急状态下调动资源，如果这种重大决策缺乏或简化了法律程序，虽然从时间上效果好，但谁能保证所有的决策都有好的效果？权力决策经验化的结果意味着程序淡化，很容易造成行政权力膨胀，行政干预司法独立。此外，缺乏严格程序约束的司法本身也有一定的随意性。再比如，人情化的网络对司法的渗透，等等。还有，社会和谐诉求、人文关怀与法律的权威性之间的关系。我在想，如果过分讲求前者，会不会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影响？反之亦然。

所以，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推动健康健全的理性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肯定是法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本文根据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在第十一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上讲座摘选整理）

（摘自2010年5月21日《检察日报》）

中国软实力建设：从理论走向实践

李 智

相比于经济实力的增长，以文化价值观、政治制度模式及外交政策为表征的软实力尚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

在冷战后的竞合型（国家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国际态势下，任何一个国家再也不可能完全靠军事实力等硬力量去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况且，由于历史的累积效应，中国的硬实力比起发达国家来仍将长期处于劣势。为此，中国亟须增强软实力；同时，中国拥有丰富的软实力资源，也能够软建设上大有可为。

增强国家软实力，可以为硬实力的增长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硬力量上升得越快，外界的担忧和敌意就越强烈。因此，有必要以软力量去“柔化”、“软化”和化解这种对国家发展不利的国际氛围。也就是说，中国要靠“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和谐社会”的政治主张、“和谐世界”的国际理念等软实力元素的宣传和践履来“修饰”、论证中国的发展，来满足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要求，从而树立起国家的国际威望，达到均衡地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的目的。

软实力建设是国家发展战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政府已经把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此战略指导下，中国应当尽快提出相应的对策，制定出既满足国际需求又符合中国国情的软实力政策。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应主要由以下三方面组成：其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核心文化价值体系，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吸引力；其二，加强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增强中国制度模式的国际吸引

力；其三，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如国际公共储备、国际规则、国际援助等），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增强中国意志的国际动员力。

进入 21 世纪以来，对应于这三方面的现实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文化价值观

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是文化价值观。其他要素——政治制度模式和外交政策都是文化价值观在制度层面的外在显现。推动中国软实力发展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即制度建设；一条是对外传播。其中，对外传播是文化软实力的权力化过程。按照中国对文化的理解，文化即“人化”，其实质是一个“化人”的过程。作为一种软实力资源，一国文化只有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得到普遍认同，进而对对象国或目标国（国家意志、态度和行为，包括其国家身份建构、国家利益界定、外交决策和对外行动等）实际地施加了影响，才能转化为一种权力即软权力。

因此，对外传播是文化软实力转化为软权力即文化软权力化的关键所在。从很大程度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就是文化的国际共有化过程，也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的过程。通过对外传播，力促中华文化（作为“私有观念”）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和认同，使之上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与国际社会共享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即“共有观念”）。其最终目标是，中华文化在国际认同中有效地“影响”相关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并与其共同构建和谐世界。

（摘自 2010 年 5 月 20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李长春：

母校九十华诞感怀

今年是我的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 90 周年。

我是 1961 年考入哈工大的，在母校度过近 7 年（因“文化大革命”影响延期分配）宝贵的青春时光。虽然离开学校已经 40 多年，但每每回想起在母校的学习生活，一切都恍若昨日，历历在目，倍感亲切。母校宏伟的主楼、宁静的校园、参天的古树、茵茵的绿地，常在梦中萦绕。紧张的学习生活、愉快的文体活动、繁忙的劳动实习、融洽的师生情谊，不时在脑海中浮现。印象最深的是，母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运用科学的教学理念和严谨的教育方法，对学生进行学识、志向和品格全方位的培养，提升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本领，使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受益终身。

母校有着严谨求实、刻苦勤勉的治学风气。校风、教风、学风代表学校的形象，好的校风是名校宝贵的无形资产，是长期铸就的校园文化。尊师重教、治学严谨是哈工大校风的优良传统。我们刚一入校，就受到了全面深入的传统教育，把“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校训牢记在心。当时学校有良好的尊师重教氛围，高铁副校长带头尊重教师、尊重人才，在学校师生中传为美谈。我记得他曾在街上看到哈工大老师在雨中步行赶路，就立即叫司机把车停下，让老师上车。学校对学术造诣特别突出的年轻教师吴从忻从助教破格提升为副教授（当时学校职称很实，教授、副教授很少），影响很大。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教师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中去。在老教师的指导和苏联专家的培养下，学校形成了一支朝气蓬勃、才华横溢、立志为党的教育事业而献身的青

年教师队伍——“八百壮士”，苏联专家撤走后，他们很快成为各个专业的骨干。他们不仅是过好“三关”，提高学校教学科研水平的骨干，更是严谨学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特别强调学生要掌握好“三基”，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们秉持“严师出高徒”和“铁将军把关”的教学理念，对学生言传身教、严格要求。我们刚入学时，全国高校理工科教材普遍缺乏，母校组织翻译俄文教材、自编教材，缓解了高校教学的燃眉之急。教学实践中，很多老师都能把抽象枯燥的公式、概念变成形象化的道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向我们娓娓道来，使教学充满了吸引力。特别是老师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精辟透彻的分析推理和条理清晰的抽象归纳能力，给学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深刻的启迪，这种不仅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的老师成为学生心目中的楷模。那时，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实行大课制，外语、答疑、自习以及专业课实行小班制。骨干教师都在教学第一线教授大课，同时也经常下到小班答疑。小班答疑并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是师生互动。学生向老师提出问题后，老师围绕学生所提的问题再反问学生一些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如果学生都掌握了，老师才回答问题；否则，就要求学生回去重新复习，然后再请老师答疑。请求老师解答疑难问题本身就是一道“关”。很多课程的考试是笔试和面试相结合，交了试卷后，再用抽签的办法确定面试题，主课老师面对面地“抠”你，看学生能否融会贯通，“活”的知识掌握得怎样，是否在死记硬背应付考试，引导学生创新解题思路。没有平时扎实的理论基础，这种面试“关”是很难过的。这种启发式、引导式的教学方法，对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独立钻研问题的能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至今，一些严师讲大课的风采和小班答疑的音容仍历历在目。当时，自觉学习、刻苦学习、创造性地学习，在同学中蔚然成风。正是得益于刻苦学习和严格训练，得益于过硬的“三基”要求，使得母校享有“工程师的摇篮”的美誉。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校期间，学校党委副书记彭云同志给我们作报告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54 年，哈工大有 6 个毕业生分配到长春第一汽

车制造厂。他们到办公室上班后了解到，厂里有规定，工程师坐皮转椅，一般技术人员和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坐木板凳。在哈工大毕业时，他们6人都已获得了工程师资格。于是，他们向一汽有关部门反映，经核实确认了他们的工程师资格，厂里马上给他们把木板凳换成了皮转椅。这个故事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大地增强了大家作为哈工大学生的强烈自豪感。

（节选自2010年6月5日《黑龙江日报》）

李源潮：

领导机关的干部

要从基层来要到基层去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是我国古代用人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承担着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领导机关的干部只有熟悉基层，才能制定符合基层实际的政策；只有经过基层历练，才能具备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创新举措，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干部工作的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大都源自基层和群众的创造。基层是实践的前沿，是思想创新、政策创新的源头，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如果各级党政机关没有一批来自基层、了解基层的领导骨干，出主意、作决策就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领导机关的干部需要从基层来。

我们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能够战胜强敌、取得胜利，靠的是干部与群众一起出生入死。解放后，我们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风险，靠的是干部与群众一起艰苦奋斗。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在改革开放和长期执政条件下，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增加了。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都反复强调，要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干部与普通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靠共同奋斗、共同生活培养起来的。光在机关大楼里成长起来的干部，既不了解农民，也不了解工人，很难与普通群众有深厚感情。只有在基层摸爬滚打过的干部，才能深刻地了解人民群众，才会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才有基础成长为一名自觉执政为民的干部。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王伯祥、沈浩等人民群众衷心爱戴的好干部，都是在基层这个熔炉里锻炼成长起来的。

干部在基层成长，干部从基层选拔，干部到基层培养，是我们党的一贯用人方针。无论是革命、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都注意把有潜力的年轻干部派到基层接受锻炼和考验，适时把具有基层领导经验的优秀干部选拔上来。这是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重要保证。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政机关干部来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考试录用公务员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个重大进步，大大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知识化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从学校门直接进机关门的干部越来越多，机关中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逐渐减少，而且机关层次越高来自基层和生产一线的越少。改革开放初，干部队伍结构的突出矛盾是年龄偏大、文化偏低，现在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问题已经得到较好解决，而“三门”干部多、基层经验少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就会造成干部队伍来源结构的根本性缺陷，一方面会增加领导机关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一方面机关有不少高学历的年轻人因为缺少实际经验而难负重任。我们要充分认识从基层培养选拔领导机关干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树立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让优秀人才到基层去，让领导机关干部从基层来。

（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的讲话）

（节选自2010年5月21日〈中直党建网〉）

现代农业的困惑

曹东勃

现代农业体系的硬伤，不可能在既有框架内得到根本解决，这就是充满悖论的现代性。我们一方面见证着包括机械物理和生物工程这两条主要进路在内的农业科技的进步，另一方面却也不断遭遇如苏丹红、注水猪、毒奶粉等食品卫生安全事件的威胁；一方面我们的粮食产量在逐年攀高，另一方面却为每年大规模农业的需水而捉襟见肘，为应对越发频繁的旱灾而疲于奔命。世界的一边是营养过剩以及生产过剩的农场主，他们焦灼地寻找和开辟过剩粮食新的渠道——用来饲养牲畜、用来“饲养”汽车，世界的另一边则是每日在饥饿或营养不良的困境中挣扎求存的亿万生灵。现代农业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诸多难题。

现代农业在追求农产品的产量与商业价值的时候，忽略环境与人自身完整性的需要，不惜以耗费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和破坏生态为代价挖掘土地、水、气候等各自然资源的增产潜力，将现代商业中完全的利润导向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模式植入传统农业，使原本具有多种功能、提供多样化产品的农业趋于价值和功能的单一化，以同质化且并无安全保障的食品流水线应对愈发异质化的消费者需求。

现代农业发明了尿素、氨等氮肥，发现了一些罕见的无机磷肥资源，这解决了养分枯竭的古老问题。然而生产现代氮肥则要耗费大量的矿物燃料，甚至需要长距离运输，这又会耗费更多的燃料。工业化武装起来的现代农业严重依赖于电力、石油等现代能源的支持，因此很容易触碰到“增长的极限”。

现代农业也从未解决如何既生产食物又不导

致土壤退化，这一有万年历史之久的古老问题。北非的沙漠在一千五百年前曾经是罗马帝国主要的粮食产地。而只要将任何土地犁上足够的时间，它都会变成那样的荒漠。同时，为了因应不断自我膨胀的、实质上却存在相当程度浪费的人类需求，不得不对森林、湖泊、草原屡屡进犯，开垦荒地的短暂收获过后，迎来的将是大自然长期的惩罚。迫在眉睫的则是，农产品产出的增加已失去了依赖粗放型土地开垦的空间，来自农业域外的各产业自身的扩张对土地的竞争性需求已经很难抑制。这样，粮食增产的压力在耕地面积逐步下降的态势下就转化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更高要求。集约化农业的过度种植，加速了土地资源退化。休闲、轮作，这是我国五千年农业文明中形成的用地、养地的成功法宝，现在却已没有条件实施，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粮食复种指数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130%攀升到160%左右，上升空间十分狭小。

水作为生命存在不可替代的自然物质和日益短缺的战略资源，是人类延续的最基本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我国现阶段的农业生产要素中，水资源的投入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大部分地区甚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我国每年水资源消耗量平均60%以上是满足农业用水。然而，我国的水资源分布在南北地区间却存在极大的失衡状态，粮食产量、农业种植压力与农业生产自然禀赋间形成了愈益严重的南北倒挂。我国北方的土地资源占60%，水资源只占20%；南方的土地资源占40%，水资源却占80%。而北方的耕地面积只有其土地面积的30%多，南方的耕地面积却占到其土地面积的80%左右。我国旱耕地

和水耕地面积大约各占耕地面积的一半，因而若撇除务农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仅从自然禀赋而言，我国农业发展最具优势的地区无疑是南方。由于南方省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明显快于北方省份，南方地区耕地资源消退的速度也快于北方，有一些甚至永久性地消退而不可复垦。因而才逐渐发生了“北粮南运”这样的结构性转变，这意味着北方缺水省份反而要承担起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更大责任，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悖论。

现代农业创造出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食品体系，这一体系为城市中产阶级消费者节省了烹调食物的时间和费用，同时也颠覆了一部分传统社会结构。我们每日都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消化着我们的祖先不曾品尝的各种食品添加剂、转基因作物。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原则同样成为食品行业的“绝对律令”，置身食品加工产业链中的企业很难不为其所俘获。他们不再重视产品本身，而是更看重其承载的“附加值”，这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他们通过选择性的采购迫使生产原料的农民也不得不采用特定的技术与要素投入，借以降低成本。

现代农业还改变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仅仅十几年前，在我的童年时代，在农村仍能随处可见散养着的各种家畜家禽，我和伙伴们就时常以拿着棒子追打一头独自觅食的老黑猪为乐事。如今则再难见此情形。不再是畜禽们为农民提供服务，而是农民站在一旁精心地侍弄着自己圈养起来的畜禽，乃至若干年前作为提供副产品或供自家食用的畜禽养殖活动被席卷入产业化浪潮之中。然而这种大规模的饲养又往往存在极大的自然风险，一旦遭遇疫病就是灭顶之灾。

现代农业，诚然是应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赢得了农业产出上的巨大成就，但是，正如现代科学表现为一种分解式、还原论的范式一样，现代农业把农业这一对象也做了类似的孤立式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来属性。农

业现代化以来的环境污染、水土流失、能量与要素的“投入产出比”极其夸张地下降趋势等等，总令人对现代农业的前景感到忧虑。

建基于理性对自身控制自然与规划社会能力的致命自负基础之上的现代农业，已然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刻。我们必须以更加合乎环境的、更加节约资源的可持续方式从事农业生产。我们的农业发展应该从过去的前现代、当前的现代化中得到启示，既不拒斥现代农业的丰硕成果，也不对其过度迷恋和盲信。在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充分利用高新技术的基础上，调整和优化农业生态系统内部结构和产业结构，最大程度地减轻环境污染，把农业生产活动真正纳入到农业生态系统循环中，实现生态的良性循环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推而广之地说，当下的中国，许多领域都正处于前现代问题、现代性状况与后现代体验交织并存的时空背景下。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复杂的现状，需要多重的视角和多种的分析。独断论式地贬斥和推崇任何一种理论模式并使自己的头脑固化，抑或动辄将学术讨论绑赴意识形态的法场，都是极不足取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大体上涵盖了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城市化和价值理性化及其互动过程。置身于这一幕宏大历史舞台的中央，中国的“三农”问题虽已被推入现代化轨道，却滞留于中途——此间充满了共时性、整体性和复杂性，让人困惑，也催人思考。既有选择地“拥抱”现代农业，同时也拾起我们传统农业中的合理成分，更需要充分倾听国外业已兴起的那种和谐的、以生态为中心、对人类自身欲望有所约束的后现代农业一类的声音。对于因为发展阶段的差异而产生的“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剔除那种恶意的意识形态纠葛和无谓的“古今中西”之辩，还是应当审慎观察，不宜意气用事而完全拒斥。

（摘自《读书》2010年第5期）

“脱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困境

符平 唐有财

我们所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代出生、拥有农村户籍的进城务工或经商的青年。现今，在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成长经历、个人诉求、文化素质、社会心态、参照目标、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行为逻辑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在诸多方面有其自身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呈倒“U”型轨迹

新生代农民工往往是出于各种原因丧失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而被“抛”进社会的。唯一有可能让他们获得高于其父辈地位的途径，便是进城打工。但这一途径充满了崎岖和不确定性，“漂泊”是这一群体的典型特征。漂泊的生活问题就是社会学话语中的社会流动问题。

流动史的研究是一个“老”问题。无论是第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都如候鸟一般在城乡之间流动。但除了这一简单的印象外，学界对“流动”这个最基本的事实缺乏更深层次的认识。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他们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就体现在流动过程中。如此，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又构成了一个“新”问题。

“流动”是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的生活状态。但流动并不仅仅只表现为他们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往返行走，更体现为他们在不同城市、在同一城市不同工厂之间的工作更换。基于这样的定义，我们在2009年的调查样本中发现他们中最短的平均0.11年就流动一次，也就是说几乎每个月更换一次工作，而最长的平均2年流动一次。其中，64.9%的人在半年不到的时间就会流动一次，能够坚持一年以上的比例非常低，只有2.7%。据此推测，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频率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频繁的流动应该说是两代农民工的重要差别之一。

虽然流动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研究发现，流动频率与他们的社会流动之间并不是

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出倒“U”型的曲线关系：在前几次流动中，流动朝向的是更好的工作地点和更好的工种，体现为垂流流动；但到第3次或第4次流动之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和寻找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了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这表明，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越频繁，其具有的市场竞争力就越少，也越缺乏从事稳定工作所需的就业技能和各种类型的资本。空间流动的多样性与社会流动的单一性是交织在一起的，通过获得更好的工作来实现向上流动的道路却并不平坦。

“脱根”

第一代农民工大多有着在城市赚了钱后回农村“落叶归根”的想法。但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超越自身先赋性社会地位的渴求。随着对土地束缚的逐步摆脱，他们不再视“土”为谋生的根基。显然，新生代农民工经过城市生活的历练，已不再熟谙乡土文化。这种品性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并型塑着他们的行为，因而与其变动不居的流动生活历程紧密相关。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相当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已不能安分守己地从事他们认为“没有出息”或太辛苦或不喜欢的工作，也不再省吃俭用地攒钱寄往农村老家，更不愿意他们的一生就同其父辈那样只是作为城市的外来者而行走于城乡之间。他们不仅无法安分守己地在农村生活、从事农业生产，在城市打工也过着频繁流动的生活，频繁地更换工作地点、职业和居住城市。这背后是新生代农民工努力避免复制父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轨迹、争取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脱根”史。

“脱根”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过程。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已经多元化。从消费项目上看，吃住、穿着、通讯、娱乐和人情等方面都有较高比例的开支，但他们仍然将近40%的收入用于不消费。这种消费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城乡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一方面，

他们有强烈的消费欲望，却也在克制自己的消费以储蓄更多的钱；另一方面，他们有强烈的融入城市的意愿，并试图以消费方式去融入城市。这种充满着矛盾的消费心理和行为逻辑，也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特征。

不可否认，由于广泛地接触到现代文明，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和吸引力。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疑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生活更大的向往以及更强的融入城市的意愿。但这种希望的实现却面临诸多困境，尤其是在各种制度约束下寻求自身超越的发展难题。现实是，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走出上一代的阴影：摆脱不了城市社会对其父辈的角色定义，无法在城市中找到认同意识或社会归属感，同他们的父辈一样遭受着身份歧视、制度排斥、隐性隔离等不公平的待遇。城市目前也缺乏他们“落地生根”的土壤。新生代农

民工挣扎“脱根”的过程无法与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过程等同起来。

新生代农民工处境的改善，需要破除制度壁垒和结构障碍。目前国家为农民工市民化出台了各种制度政策，提供了良好契机。由于第一代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已经回到了农村，所以从长远来看，如何促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核心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乃至实现市民化，绝不是简单的地理学意义上的位移，不如说是一次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从心理意愿到制度形态的全方位的转型与变迁。因此，深入研究他们怎样才能实现向上流动、回避向下流动，无论是从促进城乡融合、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社会转型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学理的知识生产角度来看，都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摘自2010年6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日本花 20 年完成“农民工”转型

在日本，没有城乡差别。日本化解“农民工”问题的经验对中国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农民工也曾遭遇不平等待遇

来自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料表明，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的“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这段期间，“农民工”占就业总人数的64%。当初，日本“农民工”进城以后，也是绝大多数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工作。统计表明，1971年，东京、横滨一带的“农民工”占全体劳动者的47.4%，东京、阪神地带则占15.8%。“农民工”中9成为男性，大多是没有成家的年轻人。

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欠薪事件等经常发生，从事高速公路、隧道建设的“农民工”还身染“尘肺症”等职业病，有的甚至为此死去。但日本毕竟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或者说是20年的时间里化解了“农民工”问题。

经济起飞时就开始转型

日本的做法简单说来，首先是日本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工”的流动自由。在日本，不存在所谓“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问题。也没有户口本，只有所谓的“誊本”。一个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

本”从当地政府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到之地政府登记即可。这种自由往来的户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日本城市的住房制度也让“农民工”安定下来。在日本的城市里面，有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对中低收入家庭保障住房的制度。这种住宅中有的当初就是为了接受“农民工”而兴建的。

再次，日本采取的是全民保险制度，进城的“农民工”都要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用保险等。这种一视同仁的保险制度，看起来是增加企业的负担，实际上确保了企业的劳动力来源，让企业不至于出现“劳工荒”。

最后，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重要的在于，日本这些化解“农民工”的制度并不是在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实施的，而是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就开始逐步实施。因此，说这些制度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公允的。

（摘自2010年6月14日《中国人口报》）

外资进入农产品行业是把双刃剑

外资进入，对于我国农产品行业来说，已显现其双刃剑特征。

相比对外资进入保持高度警惕的能源、金融、矿产等行业，中国的农业并购对外资基本没有限制。随着2008年开始的WTO关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结束，外资已经开始悄然进军中国农产品众多领域。连高盛这样的原本与农业无关的跨国公司，也开始在中国收购养猪企业。

近年来，外资进入我国农业领域的项目和资金数量均呈高速增长态势。尽管外资选择的农业产业有很大差异，但大多是集中度高、消费市场广、利润空间大、发展潜力好的优势产业。已进入的108家国家重点农业龙头企业中，有99家集中在粮油、林特产（含水果）、肉类（含鸡、牛、猪）、牛奶、水产、蔬菜产业，比重达到91.7%。外商在山东主要从事蔬菜、家禽和海水养殖及加工。

山东农村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秦庆武说，借助外资的进入，可以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标准化建设与盈利模式构建，加快我国农产品行业与国际接轨。有利于缓解农业发展中资金不足的矛盾，实现农业资金来源渠道的多元化，提高农业产业管理服务水平。但外资进入农产品领域是把双刃剑，短期可能推动地方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但从长期看存在被外资控制农产品资源和市场定价权的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外资进入农业领域有四大担忧：

一是弱化国家对农业产业的控制权。目前，我国大多数农业产业技术水平低，集中程度不高，农业企业规模小，外资在农业领域的战略布局和强劲扩张，对我国农业发展和产业安全可能带来较大威胁。外资在行业中交易取得市场垄断地位。外资进入我国农业领域的战术步骤一般是先并购同行业中一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内实力企业，避免与这些实力企业直接竞争，但让市场竞争格局发生大的变化。一旦他们占据控股地位，往往会以技术、资金、规模、品牌等优势，排挤国内同类企业，抢占我国企业市场份额，进而占据市场垄断地位，操控我国产业的发展。我国大豆、棉花等产业在这方面的教训深刻。外资垄断蔬

菜种子后产生的高价格、高风险苦果已逐步显现。业界普遍担心，一旦外资控制玉米、水稻等大田作物，可能会对国家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二是挤压中小农业企业发展空间。外资进入农业领域后，会利用垄断地位，控制定价权，实行恶性竞争，排挤和压制国内农业企业。在外资并购我国大豆产业后，全国90%以上榨油企业陷入严重亏损境地。

三是削弱农业国际竞争能力。农业资源及其知识产权尤其是种质资源及其知识产权是农业自立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种质资源及其研发资源被他人掌控，会对产业发展造成严重损害，直接削弱农业国际竞争力。美国在收集到的我国大豆品种资源的基础上，利用其先进的生物技术研发出大豆优势新品种，再大量向我国出口，并占据竞争优势地位。

“在蔬菜之乡寿光，红皮西红柿、彩椒等部分蔬果的国外品种已占据90%左右的市场份额。”山东省农业部门负责人对此表示忧虑。寿光孙集村村民孙玉爱说，外国种子虽说贵点，但产量高、抗病虫，还是划算。自己家差不多有10年不留种了，以前是买种子，现在是直接买育好的苗子。据了解，我国8000多家种子企业，没有一家市场份额达市场总量的5%，前20强的销售额加起来还不如一个美国孟山都。

山东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何启伟研究员及其团队近期对山东省境外蔬菜品种应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寿光80万亩、15种主要蔬菜中，温室大棚栽培的甜椒、无刺黄瓜、西红柿及露天栽培的胡萝卜等境外品种的占有率分别达到95%、80%、65%和80%以上，整体上境外品种占总播种面积的一半左右。

四是加大宏观调控难度和不确定性。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利用资本、技术、管理、营销、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采用上下游一体性、规模性、集中性投资的方法，很容易实现对农业产业的真正控制。如果农业大产业、大产品和龙头企业的控制权过多地掌握在外商手中，则会弱化宏观调控能力，干扰宏观调控目标，误导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国家发展战略。

（摘自2010年5月19日《经济参考报》）

贪官“潜伏期”为何越来越长

杜治洲 任建明

当前，贪官的潜伏期越来越长，某些贪官精于伪装，穿上了厚厚的“马甲”，可以成功潜伏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不被发现。

贪官潜伏期在逐年延长，有腐败行为本身的原因，也有腐败发现、调查和惩处环节的问题。

随着打击腐败力度的加强，腐败行为越来越隐蔽，查处难度加大

改革开放初期，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直接腐败比较多，现在这种很明显、很直接的方式基本上不存在了，而呈现出隐蔽化、多样化的特征。有的腐败分子钻法律空子，打擦边球，腐败手段从非法转向“合法”。有的腐败分子在受贿问题上坚持“四不要”的原则：第三人在场时不要，不信任的不要，事没有办成的不要，物品不要；还有的腐败分子为了防止被录音索贿时采用正话反说、写字条、打手势等方式。这些都增大了腐败行为的查处难度。还有一种特殊的腐败形式——期权腐败也是导致贪官潜伏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贪官的伪装程度越来越高，发现腐败变得越来越困难

1996年至2004年间，河南省“前腐后继”接连落马的3任交通厅长，一任比一任口号叫得响，但是一任比一任腐败。首先是曾锦城以“血书”表白：“我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接着，张昆桐喊出异常响亮的口号：“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二人落马后上任的石发亮喊出的口号更是令人振奋：“一个‘廉’字值千金。”而事实上石发亮腐败的数额和手段的恶劣远远超过前两任。这些腐败分子越来越善于伪装，“台上是孔繁森，台下是王宝森”，只到东窗事发之时才暴露其真实面目。

腐败呈现集团化趋势，腐败分子建立了严密的关系和厚厚的保护层

2004年2月12日在济南被执行死刑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阜阳市担任主要负责人期间，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边的小集团谋取不正当利益，建立了一个队伍庞大、生死与共的“腐败联盟”，其持续作案时间长达10年。集团腐败成员之间的相互包庇，结成攻守同盟，是集团腐败潜伏期较长、不易发现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能够长期潜伏、甚至“带病”提拔的贪

官，十之七八是上面有“保护伞”；至于“保护”的原因，倒不是说一定都是出于腐败。有的是轻信失察而被人蒙蔽；有的是出于“山头”的考虑，认为他是“我的人”，查处了我脸上无光，政绩有损。

腐败分子通过十分隐蔽的方式干预经济活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复杂，腐败分子通过十分隐蔽的方式干预经济活动，如跨国行贿等，使查处腐败的难度加大，导致潜伏期延长。近年来，跨国公司行贿案逐渐浮出水面，其潜伏期也较长。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商——美国德普公司位于天津的子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为了推销产品通过现金回扣方式向中国国有医院的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腐败潜伏期达到了12年！

反腐败的一些体制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这使得打击腐败的及时性、有效性也出现了滑坡的状况。反腐败体制性问题直接导致腐败的发现率不高、立案难、调查难和惩处难的现状。一方面反腐败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性和足够的力量。尽管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反腐败体制的改革，但是反腐败机构缺乏独立性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改善。同时，反腐败机构也缺乏相应的必要的资源和能力，从而使得腐败案件的查办和惩处受到一定的干扰和制约。另一方面，群众难以参与反腐败的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变，这也是导致贪官潜伏期延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群众监督和举报应该是提高腐败发现率的一个重要渠道。

例如廉洁程度较高的香港有97%的案件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而内地官员腐败案则远低于这个数字，内地官员尤其是高官被发现腐败问题，多是“拔出的萝卜带出的泥”。内地公众举报腐败的积极性和举报的效果都不尽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对举报人的保护，举报人遭打击报复的现象比较普遍。

当前，网络监督对提高腐败发现率、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由于网络监督的成本低、便捷性高，网民可以很方便地将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或相关线索公布于众，大大降低了腐败行为的隐蔽性，大幅提高了腐败被发现的概率。现实中许多网络反腐的成功案例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摘自《人民论坛》〈下〉2010年第5期）

中国式腐败的六大传统观念

杨曾宪

“州官能放火，我就敢点灯”

——国人的公平观念

国人“理直气壮”为从众腐败辩护之“理”，从根上讲，正是反对礼制不公的“造反有理”的“理”。封建礼制造成的贵贱地位差别，本身就是不公的，否定这种差序制度当然有正义性。但是，此“正义”非法治正义，它不以“法”定是非，而是以“劫富济贫”为目标，因此，弱势者永远“有理”。问题是，由于缺少法治社会基础，“造反”的结果，只能是改变了造反者的地位而已，不公依然存在。换言之，国人否定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事实不公，而非礼制本身；国人一直是在礼制内反礼制、用封建观念反封建。高呼“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农民造反了，目的也只是“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绝生不出华盛顿那样卸甲归田的念头。

与此同理，今天许多国人“打倒贪官”，也主要是痛恨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贫富差距，而并非是捍卫法治正义。正因缺少法治信念，所以，当腐败现象难消除时，每个人都认为社会对己不公、都能为自己的腐败找到“正义”理由：“州官能放火”，为什么我就不能“点灯”！于是，反对大官用大权腐败的小官，会心安理得地用小权腐败；反对腐败官员的平民，自己也会托人结识腐败官员……可见，国人反别人的腐败是真反，搞自己的腐败也是真搞。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

——国人的权力观念

礼制中，凡权力，都是“上”对“下”的绝对特权。有了权，就有了权辖范围内的一切，就可为所欲为、言出“法”随。尽管今日“公仆”之“公权”本质上非昔日“官爷”的“特权”，但由于官本位制度缺陷及法治信仰缺失，国人对“权”的观念并未改变，仍是既畏惧又欣羨、既憎恨又顺从，骨子里，还是极度崇拜。一人当大官，全家荣耀、全乡光荣、全县共荣。

一些人习惯用阶级分析法把腐败官员与平民百姓对立起来，这是不正确的。“官”来自“民”，社会有什么“官念”，官场上就有什么官员，这是鲁迅早阐明的道

理。一些人千方百计考官、买官、跑官，甚至以博士教授身份争官，看重的就是“权”背后的“势”、“威”、“名”、“利”。他们一旦当官，必将“公权”视同“私权”，拉帮结派、徇私舞弊、权为己用、利为己谋，甚至连传达都换上自己的“关系”。这样的官，要是不贪，反倒是不可思议的。

贪官必有淫威，所以，国人可痛骂八杆子够不到的巨贪，却绝不骂管着自己或自己有求于他的小贪。讨好而不得罪“现官”，是国人一贯处世原则。因此，一些“山寨”版的高官秘书、亲戚都能轻易谋利或行骗。为贿赂“权力”谋取私利，国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投其所好”：爱钱的送钱、贪色的送色、好文物的送文物，办法多得是。那些暴发户托人办事时，总会甩出一句：哥们，钱不是问题。这样，一面是相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一面是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刁民，再加上众多趋炎附势者铺路、搭桥，一桩桩非法交易便谈成了。当然，巨贪们也由此一路顺风地走上了“黄泉”路。

“孩子摔了跤，首先打板凳”

——国人的责任观念

礼制中，凡属责任，都由“下”对“上”无限承担。由于“礼法”维护的是权贵利益，护法自然是“肉食者”的责任了，百姓从来都是被强制担责的。这种强加的责任，当然不会内化为素质，由此便形成了梁启超所说国人凡事“责群不则己”，不承担或尽量推卸责任的习性。此传统延续下来，除非有强制要求，今日多数国人仍是不愿承担护法责任的——“枪打出头鸟”，凭什么我出头维权，成功后利益均占？明哲保身的结果，是姑息养奸，今天受害者是他人，明天就轮到了自己。众人皆不制止甚至纵容参与腐败，腐败者便愈加猖狂——这和某些地区小偷变明抢是同样的道理。腐败者愈猖狂、国人受害愈严重、怨气便越重，责任的板子便统统打到了“体制”上。“体制”当然有责任，但这并不能减轻公民个人的责任啊！

中国的孩子跌倒了，大人打板凳；板凳无语，孩子消气了。自己被腐败了、甚至参与腐败了，都怨“体制”；“体制”无语，自己便“正义”了。

“违章逮不住，那叫本事”

——国人的法律观念

尽管今日之“法”本质上非“王法”，但国人膜拜权力、漠视责任的传统观念，却必然导致了对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一些官员眼中，“刑不上大夫”，立法的目的就是治民。典型例子是某些交警上岗严查别人违章，下班自己却开车违章。而在百姓眼中，法是强加于己、约限自己利益的，当然更不会自觉守法了。这样，无论是官是民，国人都不敬畏法律，更不会信仰法治。当法利于己时，国人会非常重视；当法约束甚至影响自己利益时，国人就会像对马路上的红灯一样，视而不见。更有甚者，国人对其公然违法行为，不仅没有忌憚，有时反而像孙悟空偷吃蟠桃一样感到骄傲呢！

从官的角度讲，行使特权，就是为显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现在官员出门不能鸣锣开道了，于是，弄辆警车，也照样威风。地方交警、公路收费员必须牢记当地政要的车牌号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某些官员敢公开违法且自豪，百姓就敢偷偷违法且同样自豪。于是，能从监狱中“捞人”的，那是大“牛人”本事；敢酒后开车的，那是小“牛人”本事；老老实实守法，那只能表明你没本事，甚至会遭人斥责。在各种聚会上，常遇这种自吹其本事的“牛人”。可悲的是，尽管“牛人”违法侵犯的恰恰是其他公民的利益——譬如，酒驾者可能撞倒我们的亲人——但这不妨碍利益被损害者对其鼓掌！在此类场合中，我从未见到一个人（当然也包括本人）对其“鼓倒掌”的。

违法行为，任何国家都不鲜见；但如此违法不当事、反以为荣者，却绝对鲜见于法治国家。

“中国人，面子要紧”

——国人的面子观念

中国人的“面子”是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发现”的，他的《中国人的素质》第一章标题就是“面子要紧”。面子的确是理解中国国民性与儒家伦理的一把钥匙。“讲面子”范围限于情缘关系，“讲面子”法则基于礼义规范，这些都与儒家相关。吴思先生独具慧眼，创造了“潜规则”概念，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因为传统的“潜规则”，就是在情缘关系中公开实行的“礼规则”，其中便包括利益共享、彼此互敬“给面子”法则。今日中国，封建“礼纲”被废除、甚至颠倒了（如“媳妇虐待婆婆”），但“礼义”规范却以“面子法则”方式承继下来了。根据面子法则办事，绝非都是腐败，但它却为中国式腐败提供了一条合“礼”有“义”

的程序化路径。

行贿并非国粹，“黑金”各国皆有。但如吴思先生所说，国人一旦给“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就将“贿银”变成了必须“笑纳”的“礼金”了。“给面子”，把丑恶的权钱“交易”变成礼尚往来的“交情”，确是中国式腐败的一大特征。一些巨贪之所以能日进斗金，就因为只要他肯“给面子”，就有无数“关系”愿排队“送银子”。而对那些清廉官员而言，这面子法则却可能使其良心天天处在煎熬中。

人们或许会感到疑惑：不畏法律的国人，为什么对这面子法则反倒敬畏如此呢？这是因为面子体现着国人的荣辱观念，丢什么，也不能丢面子。如一位德国教授“发现”的：国人“面子”不同于西方“体面”，它是在情缘关系中的“复数”存在。国人是否守法，只是个人行为；而是否讲面子，却牵扯到情缘关系中所有人的荣辱。如不给某人“面子”，便是不给某群人“面子”，就要受到“不仗义”的舆论制裁，这就会出现变成“公敌”的情况。

“兔子不吃窝边草”

——国人的私德观念

私德是相对公德而言的。公德维护的是法治规范，私德维护的是礼制规范。是否践行公德，与面子无关；是否践行私德，与面子有关。“私德”不姓“公”，所以，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私德不仅不制止，反而会助长、纵容。譬如国人吃请，对方是“私款”、还是“公款”，这是要搞清的“首要问题”。私款请客，点菜别太贵，意思到就行了；公款吃喝，千万别客气，“不吃白不吃”。以此类推，凡损公肥私的腐败行为，私德是不会干预的。

但“私德”也是“德”，儒家伦理更是讲“爱”的，“仁者爱人”嘛。有私德约束，一些丧尽天良的腐败行为总不该发生吧！像豆腐渣工程，一旦楼倒路垮是要死人的。但给了回扣，这种工程就能评上优秀。像假药之类产品，拿了好处就批文，简直等于参与谋杀。贪官为什么缺德如此呢？这就涉及私德的外延问题了。私德或儒家仁爱是维持情缘关系的，它有“德”有“爱”，但又有“边”有“界”。《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五服”之内的亲戚，是要讲仁爱的，否则便是“六亲不认”；但“五服”之外的陌生人，理所当然漠然待之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说的就是再缺德也不能害乡亲。至于是否“吃”了外面的“草”，甚至成为江洋大盗，乡亲们是不闻不问的。

（摘自2010年6月3日《社会科学报》）

经济指标体系如何揭示“真实”

高帆

加快发展方式转型，是我国回应国内外多重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抉择；它内在要求对经济指标体系作出调整，以更好地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态和趋向。

GDP 难以揭示“长期的财富创造能力”

就经济增长而言，以 GDP 及 GDP 增长率为指标，能反映我国国内在特定期限产出的全部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并进行不同时期情况的比较；国际社会通常也用它测度和比较各国的经济成长性。然而，这个指标难以揭示“长期的财富创造能力”。它的缺陷包括：

——GDP 及其增长率是生产性指标，难以揭示商品和服务是否最终完成了从供给向需求的“惊险的跳跃”，而商品和服务只有转化为消费，才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居民福利的终极意义。

——它是产出性指标，难以揭示商品和服务的当期供给水平是否“损害”了长期生产能力，而能源、环境等不可再生资源的跨期均衡配置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它是货币性指标，即使在商品和服务产出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变动也会导致 GDP 及其增长率出现“合意性”转变。

——它是总量性指标，难以揭示商品和服务在不同群体之间的配置结构，而收入分配差距会加剧市场经济中的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显然，在经济指标体系中，GDP 及其增长率依然是度量经济增长的关键性指标，但必须引入其他指标，如绿色 GDP、能源消耗弹性系数、基尼系数等来弥补它的功能性缺陷；多元化而不是单一性的指标，有利于揭示发展方式转型的方位和成效。

应根据居民真实体验调整 CPI 的商品权重

我国 CPI 主要由 8 大类商品价格加权计算得出。统计部门迄今并未公布这 8 大类商品在 CPI 计算中的权重，但根据统计资料推算：食品的权重约为 32.4%，而居住的权重约为 15.0%。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呈现持续下降趋势，而住房开支在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总支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住房的消费品基本属性和大额支出特征，要求 CPI 涵盖房价变动。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 CPI 中的居住类权重低于美国 42% 和欧盟 23% 的水平。

应该承认，我国现行的 CPI 数据难以精确反映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的真实状态。进一步地，CPI 标度了前期货币发行和商品供给之间的关系，以 CPI 这个滞后变量来确定货币政策可能会面临“时点对接”难题。据此，我国应根据居民真实体验来调整 CPI 的商品权重，增强 CPI 统计的精准性、灵活性和透明度，并基于货币供应、PPI 以及 CPI 之间的传导路径来增强货币政策的前瞻性。

以城镇登记失业率反映我国就业状况存在偏差

2009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 921 万，失业率为 4.3%。而事实上，以城镇登记失业率来标度我国的就业状况是存在偏差的，原因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依然十分显著，2008 年我国农村就业人数为 4.76 亿人，占整体就业人数的比重为 61.88%；国务院第二次农业普查资料也显示，2006 年底我国农村户籍劳动力资源数量约为 6.09 亿，其中外出务工人员（农民工）约为 1.32 亿。现行统计指标没有涵盖农村劳动力以及二元结构转化中的农民工，也不能瞄准城镇内部失业但未作

2010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 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改革

制订三网融合试点方案并开展试点；推进电力体制改革，完成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推进盐业管理体制改革。

● 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

推行居民用电阶梯价格制度；稳步推进水价改革，在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全面推行城市污水、垃圾及医疗废物等处理收费制度；制订出台推进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并扩大试点范围。

●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修订出台《贷款通则》，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加快发展多层次信贷市场。

尽快出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制订出台存款保险条例。

● 深化民生保障体制改革

研究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的思路，提出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措施。

改革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制度，完善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分

配和监管制度。

全面实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

加快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

● 深化社会领域改革

出台并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创新举国体制。

● 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

进一步简化和规范外资审批程序，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研究推进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研究提出深化政府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的意见。

● 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深化改革，率先突破，形成有推广价值的改革经验。

（摘自2010年6月1日《新京报》）

登记的社会群体，因此难以准确揭示我国社会就业的真实状况。由此应尽快采用更具涵盖性和精确性的调查失业率，逐步补充和取代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以提高就业数据对经济现实的反映能力和对政策制定的指引功能。

需增加统计指标来标度国内外经济关联性

在现行统计体系中，通常用贸易顺差、逆差和贸易依存度等指标来标度国际贸易状况，用实际使用外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等指标标度资本利用情形。然而，这些统计指标并不足以全面反映国内

外经济关联性，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动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国内物价总水平；但在经常项目自由兑换而资本项目不可自由兑换的背景下，境外“热钱”仍会以多种变通方式流入并“潜伏”国内，以期获取利率差、汇率差和资产价格差等投机投资收益。由此，我国统计体系必须将国外主要市场、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考虑在内，据此构建域外商品和要素价格预警机制；同时应在强化监管的基础上对“热钱”流入流出进行估算和测算，以努力减弱资本流向逆转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可能冲击。

（摘自2010年6月7日《文汇报》）

审视经济数字多个侧面

李开发

2010年已经过去近半，在2009年中因应世界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已慢慢退出。2010年需要完全依靠内在的消费与出口因素发展，经济转型，结构调整，低端产业面临升级换代，社会各个利益群体面对转型时期利益格局中的地位的冲突等，对在金融危机中大病初愈的中国经济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把握节奏，而核心是研究经济增长数字背后的真实现象，从容调控，统筹兼顾。

关于4万亿元投资

关于4万亿元投资，资料显示，80%的投资进入了“铁公基”领域（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铁公基”等城市环境改造的投入，是合法的城市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但是这些工程大量开工的另一个背景是，给官员们的腐败带来了大量的机会。近5年中，大贪污犯必与大工程联系，80%的贪官来自于在“铁公基”工程项目贪腐受贿。工程不动，贿赂何来？近两年我们调研了许多城市，城市“铁公基”工程都有了超常的规模，一些城市尚未使用的“新城区”虽然仍是空地，但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数十公里夜晚华灯闪亮，道路广阔，一些铁路公路项目，甚至5年后也未必有足够的人流车流。需要审视的是，我们的大量投资是否投在有效率的领域？

关于GDP增速

许多情况下，GDP并不代表财富增值。最核心的是要分清有效GDP与无效GDP。什么是无效GDP？假定一个城市，硬要把企业区与职工住宅区分隔为20公里，每天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职工上下班的费用，通勤费用，全是无效GDP。

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现象却是，工程拆了建，建了拆，道路建成了再挖开，创造的都是GDP。据考察，许多一线城市近些年的GDP无效部分，或者叫作泡沫部分，至少已经超过10%，值得警惕。那些没有真实效用的GDP，其实就是浪费。

关于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另类解读

有数字显示，2009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比往年增

加了30%，已经超过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0%，这种增速，在一个城市尚可，但是用于一个国家时，有些令人担忧。因为这表示我们的增长是严重依赖投资的国民经济增长，是一种严重不均衡的增长。

如此严重不均衡的增长会带来较为严重的后果：一是它不能持续；二是产业机会不均等；三是社会畸形发展；四是贫富分化、两极对峙。

细细分析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可以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房地产占尽天时地利，在许多地方，一切优惠政策无所不用其极。央企进一步扩大垄断资源，垄断资本。在80%的民营企业领域，一片萧瑟，诸如服装食品机械等，年利润多数不超过3%，一些企业减员让利，艰难地维持运行。

关于进出口指标数字背后的内涵

关于进出口指标，2009年年底的数字显示已经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个数字需要研究。

它有六种情况可能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其一，出口总量增长，但价格下降；其二，出口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本，勉强维持；其三，同行互相杀价，互相挤对，必不长久；其四，供应增长，外国相关企业存货增加，中国企业只有加大供应，才能保持产值平衡，这将逼迫中国资源越来越廉价出口；其五，企业由于亏损，无力进入技术投入，创新能力丧失；其六，员工收入下降，劳资矛盾加剧。因而，这些数字背后的问题反映了一个事实：失衡的经济发展不能持久，需要努力加以解决。

关于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这个数字要客观看待，一面是成绩，一面是问题，不能专看一面。

首先，外汇储备数量增长并不能说明我们比较优势的增长，有可能是价格下降。而价格下降对应的是同样的资源实现的价值低估，有可能是资源廉价出售。另一种情况是企业降低成本，如削减员工工资福利等，这显然不是好事。

其次，外汇储备数量增长从另一面显示我们没有实现比较优势，即不能用外汇采购到急需且实用

的产品或技术，它不利于我们长远发展。它表明，如果采购的技术没有对接基础，说明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弱小，或政策引导出现问题，轻技术创新而过于重视量的增长，经济没有增长的后劲。

此外，外汇储备数量增长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巨大风险。一方面，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外汇的有效价值降低，属于社会经济总量增长导致贬值。20年前的10万元可以买到两套房屋，20年后只能买一个厕所。另一方面，外汇储备过多，实际上为海外提供了低廉的投资资金，实体的投资是增加了被投资国的就业机会与经济复兴。这些情况，对中国经济发展都是不利的。

研究经济发展数字背后的内涵，掌握经济发展的多个层面的动量与质量，对调控尤为必要。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23期）

产权、激励与收入

金志奇

产权与激励和收入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但产权界定和保护是由国家来实施的。“公民的兴趣在于尽可能多的取得更多的收入；但国家也同样如此，因为国家在这个时期的生存依赖于扩大现有的收入。”这一现象表明国家与个人在收入分配上处于矛盾状态。

国家作为处于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地位，为了保证自己收入的最大化，会无视无效率产权的存在。

改革以前的20多年时间里，国家采取了公有制的产权组织形式，个体私营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被割除，这与其说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倒不如说是为了更方便地最大化国家收入。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背景下，把农民组织在国家控制的集体组织中，以便通过非市场方式取得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所必需的资金、粮食和农产品原材料就成为必然的选择。通过高级社以至人民公社这种“一大

二公”的“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来“稀释”产权。由此，个体农民的财产合并为不可分割的集体财产，高级社拥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都无偿地归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支配。但是，这样的产权结构并不能给农民一个稳定的预期，更不能产生正激励，“干多干少一个样”在分配上必然是平均主义。结果，“搞社会主义二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种状态迫使国家进行以放权让利为标志的改革，但当这种改革给国家带来的利益不如个人大时，国家就改变规则，继续保持对无效率产权的垄断。

国家以垄断的方式独占收入。目前，国有企业在石油天然气开采、电力等能源工业、黑色金属工业、铁路民航、高速公路、供水供气供热、管道运输、邮政电信、金融等行业或部门占据垄断地位，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2004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近60%，达4785亿元，其中60%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中海油、宝钢、中远集团等少数企业。至2008年同样如此。这些企业都是垄断性企业，它们获取的高额利润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家的特殊政策，而不是靠自身的高效率。

此外，国家还通过专营的方式获取更大面积的收入。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实行专营使国家获取了大面积的收入，如对盐的专营使之能够对消费这些商品的所有人征税。专营这一古老的收入工具在市场机制下依然对国家的收入起着重要的作用。其行为可以给国家带来暂时的利益但却是以市场垄断、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和损害基层人民群众的自由和利益为代价的。

虽然国家能够征收到更多的收入，但其行为也并不无度。一是过重的税负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因而易引起反抗；二是经济全球化限制了国家税收的权力，如果一国税收负担过重会引起资本外流从而丧失税源。经验和教训使国家变得聪明起来，国家通过借债获得收入以缓和与个人的收入分配矛盾。政治家们发现，靠借债来提供财政支出比征税来组织财政收入容易得多。在国家取得收入来源以弥补不足支出这个问题上，政治家们都放弃了加重税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借债的方式。这不仅有其理论上的支持而且也有实践上的易行之处。征税是一种强制性行为，而借债是一种商业信用关系，

27位部长的成功之道

胡骏

27位部长，有本行业工作经历的22位，占81%，其中，一直在该行业工作的有11位，占40%，而这里面，被公认为该领域专家的有8位，占30%。这样的工作经历，这样长期的专业训练，使各位部长对自己的工作领域业务十分熟悉，专业能力十分突出。

北京“两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里有一个群体，国务院组成部委的各位部长，成为众多媒体竞相追逐的主要目标。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为8位部长举行了专门的记者招待会，他们从各自主管的领域解读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政策进行分析，对走势进行预测，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广大民众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问题。

部长们凭借娴熟的业务能力，睿智的分析，自信、沉稳的表达，通过各种媒体的传播，使普通大众对国家的政策走向有所了解，对国家的形势有了把握，并从某些方面给民众以信心和力量，他们的表现给社会各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探析一下这些部长的成就之道，寻求一些干部成长规律，就成了十分有意义的一件事。

专业：部长的成就之基

专业，是我们对部长们的第一印象。27位部长，拥有本行业工作经历的有22位，占81%，其中，一直在该行业工作的有11位，占40%，而这里面，被公认为该领域专家的有8位，占30%。这样长期的专业训练，使各位部长对自己的工作领域业务十分熟悉，专业能力十分突出。从学历看，本科以上的

占80%，其中还有博士7人，硕士5人，可以看出这些部长们有着良好的知识背景与基础。

因为专业，部长们都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国务院27个组成部委，是国务院对国家经济社会方方面面进行管理与指导的职能部门，分别担负某一领域的政策制定、政策指导、政策执行、政策监督的责任，因此，具有较高政策水平成为他们首要的能力。这就要有扎实的专业能力作为基础，部长们长期在该行业工作，深谙其中之道，既能提出符合现实需要，针对性强的政策，又能务实操作执行。

因为专业，部长们有很强的业务指导能力。每一个部长都熟悉自己的业务领域，这对地域辽阔、地区差异大、民俗风情大不同的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他们可以对31个省市区，在该领域的工作进行指导，按照国家统一要求，让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把工作任务完成好。

因为专业，部长们对全局能发挥很好的参谋作用。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因素多，全局性强，需要各领域的人从各自不同的子系统出发，提出政策、策略与对策，在国家宏观层面来进行融合，出台面向世界，着眼全国的宏观政策与调控措施。专业，使部长们成为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参谋。

因而用借债来替代征税就是用自愿的选择代替了强制性的资源配置。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之所以能够拿出钱来借给国家，是因为政府降低了税率，使得人们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凯恩斯则论述了借债比征税更具优越性，认为，应该主要发行公债，而不应该依靠增加税收的办法。而调节税收尤其是实行累进所得税，虽然可以消除财富与所得的不公平，提高消费倾向，甚至可以扩大就业，但是因为短期内消费倾向相对稳定，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另外，企业和个人用于购买公债的资

金是他们手中不打算存入银行或购买商品的闲置资金。在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并不影响企业和个人消费和投资。而税收不同，增加税收，可能会导致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的减少，两种作用相互抵消，则不能达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目的。因此，用发行公债的方式取得收入不会得到来自投资者的反对，执行起来也容易，不失为缓解国家与个人收入分配矛盾的好办法。

（作者为河北省党校经济学教授）

（摘自2010年第3期《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值得关注的是，27位部长中有3位大专学历和2位中专学历。特别是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前两年引起全国多方关注，从这可以看出，专业经历、训练和专业学习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张平在安徽省就担任过省发改委主任职务，他在工作中通过自己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不断超越自我，成为该领域行家里手，近一年多来发改委在迎击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就彰显了张平的业务能力。从这也可以看出，中央在用人问题上重学历而不唯学历。

台阶：部长的磨砺之途

研究这些部长的任职简历，可以发现，他们几乎都是从科、处、司、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晋升上来的，而且在同一层级还有多岗位任职经历，在成长轨迹上基本没有突变点，可以说是拾阶而上。在平均年龄48岁时，他们走上副部长岗位，在平均年龄56岁时，他们终于经过层层磨砺，成为各部部长，到了他们每个人的黄金工作期。

这样拾阶而上的磨砺之途，使他们在每一个层次都提升了自己某方面能力，丰富了自己。在科级，他们是具体承办者，他们学会执行，了解机关工作规律。在处级，他们常在复杂第一线，锻炼了他们的组织能力、政策起草能力。在司级，他们处在制订和执行政策、分配资源、利益调整的中枢位置，在协调各方中增强了战略思维能力和大局意识。在副部级领导层级上，他们大多经历多岗位磨炼，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国家意识、主持某方面工作的能力。

这样拾阶而上的磨砺之途，一步一个脚印，养成了他们细致、严谨、耐心的工作作风。细致，使他们分析问题透彻，制定政策全面，不偏不倚。严谨，使他们政策把握准，原则性强，执行中不走样，也是国家管理某行业的坚定监督者。耐心，使他们对方方面面压力时能沉稳、不慌张，对下指导工作时不急于求成，对形成和谐政治局面有好处。

这样拾阶而上的磨砺之途，也使他们身心得到极大的锻炼，使他们拥有较健康的身体和稳定的心理。到他们从每一层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部长时，他们都能洞穿世事、心态稳定、神态安详，极其成熟。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政治立场坚定，在原则问题上头脑清醒，在纷繁复杂事务中能游刃有余，从这

些部长的起点看，近八成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教师，这些岗位的职业特点与要求，也为他们晋升之阶作了有益铺垫。

协调：部长的立身之本

国家的宏观管理，既要重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要面对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还有现在日益突出的阶层差别，也就是要权衡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和团体的利益，因此，协调，就成为各部部长最基本的工作。

27位部长，同时有中央和地方工作经历的占88%，近九成。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群体中，有近八成的人有过最基层的工作经历，他们当过插队知青、基层士兵，或从事过乡村工作，这些经历成为他们拥有超强协调能力的基石。

拥有中央和地方工作经验和最基层历练，使他们对各方利益有正确认识，既有全国观点，有大局意识，也承认地方利益。对国情有把握，理解各阶层的利益诉求。这种重视各方利益的合理性，成为他们权衡利弊、协调各方，善于从各方利益结合点上考虑问题、谋划工作的重要心理基础。这使他们在制定政策时既考虑全国的统一性，也考虑地方的特殊性；分配国家资源时既考虑均衡性，也考虑差异性；进行利益调整时，既考虑效率，也考虑公平和公正。

拥有中央和地方工作经验和最基层历练，使他们对方方面面的工作对象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沟通方式有直接的了解和把握，能针对不同对象运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在长期工作实践中，他们协调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日趋成熟，协调沟通的渠道日益增多，能自如地应对复杂局面。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群体都拥有基层历练，这是这个年龄段人共有的特征，是历史的印迹，但对他们是受益匪浅的。一方面，他们能从那样的环境中走出来，说明他们有十分顽强的毅力，超强的学习能力，和不为环境左右的能力，这成为他们作为部长内在的坚强的“核”。另一方面，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即使在国家管理的最高层，也不会不知道民间的疾苦，他们与基层，与最普通的老百姓有天然的联系和纽带，这成为他们协调各方、关注民生，切实做到执政为民坚实的基础。

（摘自《决策》2010年第4期）

向中南海进言的中国智囊

张文祥

▶ 经济学家加重智囊分量

2010年3月底，央行下发通知，经国务院批准，任命周其仁、夏斌、李稻葵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由国务院来任命智囊，这虽不说罕见，但也非同寻常，这彰显了3位学者不同一般的作用。

货币政策委员会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而是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咨询议事机构，但其在会议中形成的建议书或会议纪要，将会对国务院形成的最终决定起到非同小可的作用。

3位经济学家同时入选，创下了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非官员人数之最，更反映了中央在面临全球经济复苏的诸多不确定性，国内经济走势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时，迫切希望他们提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建议，最终有利于加强宏观调控实施效果之期望。

从此次进入央行的3位人士的简历来看，他们早已经是这方面的专才。周其仁被誉为“中国最有悟性的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属于“全能型”学者，早在2009年6月份，周其仁就在《货币似蜜，最后还是水》的文章中，对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引发的物价上涨表示忧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是中国经济学界最为活跃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多次对中国经济前景高调“唱多”，去年抛出的“中国经济总量超日本”、“二次房改”等观点多次引发学界热议。而夏斌目前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多年在央行等金融机构工作的他有着丰富的业务背景。

当今的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仍放在经济建设与发展上，而这种倾向也导致经济学家成了智囊团里分量最重的一批人，并且享有比其他领域智囊更多的曝光率。

▶ 如何向中南海进言？

能够影响中南海经济决策的智囊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家直属的大单位，比如中央党校、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包括一些职能部门的研究

机构，比如财政部、商务部的研究所；二是重点大学下设的专门的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

各方智囊在影响中南海方面有着不同一般的渠道，社科院“几乎每天都要向中办和国办报送材料”，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报送数量逐年增长。

智囊机构影响决策的另外一个直接途径则是成为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课者，这或许是影响高层最直接的手段，而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经走进过中南海为常委们授课。“虽然讲稿为集体智慧，但后面专家回答问题时可以讲述个人的观点。”有学者如是说。

事实上，除去各种公开渠道外，智囊机构影响高层决策还有一种方式，即各种“内参”，公开资料显示，这些内参一般可报送中办和国办。

还有一个无法忽视的渠道则是智囊机构学者对相关官员的私人影响，这被称为“纳谏”。复旦大学教授孙哲于2004年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文章曾列举了智囊机构学者在外交领域施展私人影响的情况：“‘纳谏’行为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一种体现在一些重要外交智囊撰写的内参报告上，此类报告通常直接交给某些重要领导人或其秘书；一种体现在思想库人员与领导私下接触的谈话、专题汇报中的外交设想中；一种则是学者在研讨会发言或某些活动之后因发表某类看法受到领导重视，奉命完成的更为详细的专题报告。”

▶ 智囊，不能做应声虫

英国人 Mark Leonard 曾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一名智囊。有次他拜访中国社科院，当他获知社科院有50个研究所，260个研究室，4000名全职人员时，他被彻底雷到：整个英国的全部智库人数加起来也只有1000人左右，全欧洲总人数不到5000人。

《瞭望》杂志曾经刊文抨击一些智囊专家只会“揣摩上意”，“中国的智库存在一些不足，因受到所在主管部门的局限性，在研究方向、内容上比较单一，出来的研究结果仅限部门观点，对全局性、战略性、

“地板干部”的烦恼

刘新圣

“地板干部”大多默默无闻，但他们却是直接与公众打交道的主要群体，撑起了社会发展的基石，他们的生存状态和诉求更加值得关注。

“地板干部”，长期在基层工作，难有晋升机会，权力不大，压力不小。

近期，记者在河北某县级市调研时了解到，该市核定的乡科级领导职数为407人，仅占公务员总数的10.55%，与乡科级以下非领导干部比为1:8.1。像一个金字塔，处在塔尖的就是那么几个人，大部分工作人员很有可能在科员位置上退休。

“地板干部”的烦恼：长期甚至终生都在“原地踏步”，权力不大，压力不小

长期甚至终生都在“原地踏步”。一位刚刚被提拔为副镇长的同志告诉人民论坛记者：“我从办事员干起，已经干了30多年了。”“晋升道路狭窄，现在想到县里工作，主要是靠公务员内部的考试。在基层，处理的是老百姓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光凭考试，那我们肯定不行。”一位40多岁的乡财政所工作人员说。

工作压力大常常被领导忽略或被公众“误读”，受着“夹板气”，也是基层干部们反映最多的一个方面。一位镇政府干事说：“现在老百姓普遍存在着对基层干部的不信任，认为中央的政策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基层的执行上，是我们‘念歪了经’。”

记者联系采访了河北、山东、河南和海南四地的20位“地板干部”，他们说，责任大，权力小，是让他们最头疼的事。“现在我们这个地区发展的压

前瞻性的研究更少。”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表示。

我国研究机构多设在党政机关内部或由国家财政供养，国外则是由民间资金赞助。全部市场化运作，不用国家一分钱，这有利于保持中心研究的独立性。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说，衡量一个好智库的标准是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但对大多数中国智库来说，独立性可望而不可及，质量与

力很大，一级压一级，我们在基层压力最大。可是现在的财政体制有些不合理，我们地方的财政资金不足，‘小马拉大车’。”河南的一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招商引资的任务年年下达，市里给县里定指标，县里就给我们定指标。任务要完成，收的钱上交，可财政划拨给地方的太少。在县里我们镇经济发展水平算是最好的，收入过亿，可财政留在镇里的只有区区几百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每次都是等米下锅。”

“权力小、责任大，压力不小。”这是接受采访的“地板干部”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权责不对称是当前乡镇工作压力大的最重要原因。村子里实行村民自治，镇上党政机关人员是县里任命，事业机关工作人员由县里的主管部门管理。乡镇几乎没有人事权。加之，一方面合乡并镇的推行，基层政权管辖的范围扩大了，事务增多了，另一方面是工作人员愈来愈少，“现在基层矛盾不少，各种纠纷越来越多。我们感觉工作量很大，人手明显不够。”一位同志如是说。

尊重“地板”，把握基层

正因为身处“地板”，所以才能“接地气”。“地板”干部位卑权小，可地位却极端重要。一言一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些人就是党和政府的“名片”。一个地方的人气高不高、旺不旺很大程度上

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中国智库的这些缺陷严重影响了现代智库应有的社会功能发挥。”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在“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中提出，中国智库在社会功能发挥上的缺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国家形象的正面传播。

（摘自《看世界》2010年第5期）

专家解读人才发展纲要亮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是我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是我国今后一个时期人才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请他们对人才纲要中的亮点进行点评。

修正现行“中国模式”

【条文】 人才资源总量从现在的1.14亿人增加到1.8亿人,增长58%,人才资源占人力资源总量的比重提高到16%,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点评】 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如果继续维持低价劳动力付出的发展模式,中国呼吁了多年的“内需经济”和“转变发展方式”就无法实现。“解决这一问题,只能是让‘中国模式’在全球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从‘人口’转向‘人才’,对现行‘中

国模式’进行修正,进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发展知识经济,打造创新型国家。”

用好、用活人才

【条文】 把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围绕用好、用活人才来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积极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和实现价值提供机会和条件,使全社会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点评】 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表示,“以用为本”应当是今后我国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成为加快人才发展的助推器。按照“以用为本”的思想改革人才工作管理体制,要进一步完善党管人才工作新格局,特别是健全相应的决策、协调和落实等工作运行机制。同时,要从体制上改进人才管理方式,转变政府人才管理职能,进

体现在基层工作者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上,一个政府能不能得民心、负责任、有效率就体现在每一个公职人员的日常琐碎的工作中。他们心里有牢骚,有怨气,难免会带到工作中去。要么消极怠惰,要么吹吹拍拍,更有甚者将怨气撒到群众头上,直接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被很多“地板干部”的事迹感动。一位在基层工作20几年的老同志说:“你问我对仕途有什么想法,我实话给你说,我就想着,工作能轻松点,有点时间陪女儿。我家在城里,来镇上工作20几年了。每天还是来回跑。刚来时女儿还没上幼儿园,现在大学都快毕业了。其实我们这些人都是当地人,你工作干得不好,乡亲们也会指指点点。工作很累,过不了什么假期的。”

“你说我是‘地板’官员,我想说的是做个‘地板’官员没什么,我们缺乏的是‘成就感’。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官再大也就是到县里当个局长、副县长,我们还是想干点实际工作,主要是现在责任无限大,权力很有限。克服了这一点,我愿意做个快乐的‘地板干部’。”一位“地板干部”

直抒胸臆。

破除官本位,从制度上为“地板干部”创造舞台。“地板干部”中不乏埋头苦干者,不乏淡泊名利者,不乏“老实人”,更不乏“想干事”、“能成事”的人,他们“惟事不惟官”的态度是正确的政绩观、科学的价值观、高尚的人生观的体现。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干部,我们党执政的根基才坚如磐石。

为此,从制度上给广大“地板干部”以希望,对锻造一支真心为民、能上能下的精干的干部队伍有重要意义。

基层本就是锻炼干部的大课堂,也是披沙拣金的大熔炉。干部是比出来,练出来的,不是听出来的,看出来的。当前,一方面,全国大部分省份都出台了从基层选拔干部的规定,另一方面,乡镇改革的探索也在前进,不少省份进行了“扩权强镇”的试点,目标就在于按照权责统一、提高效能的要求,做实乡镇这一级国家政权。从制度上为“地板干部”创造舞台。

(摘自2010年5月18日《新华网》)

一步简政放权，深化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管理体制，转换用人机制，扩大和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

人才政策更加开放

【条文】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制定完善出入境和长期居留、税收、保险、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安置，担任领导职务、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参与国家标准制定、参加院士评选和政府奖励等方面的特殊政策措施。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特聘专家制度。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创业或以多种方式为国服务。

【点评】王辉耀说，人才规划提出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是一个新的突破，而且也是一个新的政策亮点。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涉及海外人才在国内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就需要很多具体政策来做支撑，比如说我们实施更加开放的海外留学人才吸引政策，外国专家来华工作政策等。“我认为，这次的人才规划超出了以往任何时期的规划，同时具有可操作性，也比较具体，会带动中国未来一个更大的发展。”王辉耀说。

社会工作人才首次列入建设规划

【条文】建立不同学历层次教育协调配套、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加强社会工作学科专业体系建设。建设一批社会工作培训基地。加强社会工作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培训，制定社会工作培训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健全社会工作人才评价制度。

【点评】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说，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实际上就是围绕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建立起来一支能够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专业化队伍。他表示，现在社会工作人才实际上是一个“短板”。因为过去是分散的，大家不知道什么是社工人才、怎么发挥作用，人才规划中明确社工人才作为一支队伍，并将有计划、有组织地去开发这支队伍，这应该是全社会都企盼的一件事情。“有了这样一支队伍，老百姓遇到问题会感受到，确实有一支队伍在为他们服务了。”吴江说。

人才激励保障机制有新突破

【条文】完善分配、激励、保障制度，建立健

全与工作业绩紧密联系、充分体现人才价值、有利于激发人才活力和维护人才合法权益的激励保障机制。建立产权激励制度，制定知识、技术、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办法。健全国有企业人才激励机制，推行股权、期权等中长期激励办法，重点向创新创业人才倾斜。

【点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认为，人才规划体现了以人才保障激励政策鼓励人们离岗创业的思路。现在有很多优秀在职人员，由于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管理经验，或者掌握重要专利技术，具有较强的创业能力。人才规划提出的相关扶持政策，目的就在于为在职优秀人才离岗创业排除后顾之忧。强化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对解决目前我国人才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医院、高校等事业单位将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条文】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科研、医疗等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等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

【点评】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名誉所长沈荣华认为，目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存在的行政级别，是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这样的行政级别应该取消。今后，对于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应该由社会来对其进行评价，而不是其主管机关。

提高人才工作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考核中的权重

【条文】健全各级党委人才工作领导机构，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和督促落实机制，形成统分结合、上下联动、协调高效、整体推进的人才工作运行机制。建立党委、政府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提高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核指标体系中人才工作专项考核的权重。

【点评】王通讯认为，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创新党管人才方式方法，将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人才工作格局。

（摘自2010年6月9日《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赵超 谭浩）

建设人才强国：

一个举世瞩目的战略目标

人才强国战略内涵丰富，但其核心要求集中起来主要有两层意思：第一，中国必须依靠人才强国，实现现代化；第二，中国应该也能够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建成人才强国。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战略目标。因为，建设人才强国的必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有目共睹——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研究员、《人才规划纲要》专家顾问组首席专家杨伟民认为，“人才发展要紧扣国家发展总体战略。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加大人才资源开发力度，把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形成与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基础。”

把中国建成世界人才强国，可行性有多大？专家们普遍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人才强国，应从规模、素质、效能3个方面来衡量。

一看人才规模。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说：“要成为世界人才强国，就得具备一定的人才资源规模。从体量上说，我国已是人才资源大国了，进一步建成人才强国将成为挡不住的趋势。”有关研究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已达1.14亿人。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将达到1.8亿人，居世界第一或第二位。

二看人才素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认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必将为人才大量涌现特别是整体素质的提高奠定很好的基础。国家统计局统计专家王文颖分析测算后得出结论：

2007年，我国主要劳动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8.6%，到2020年将达20%，接近部分经合组织(OECD)国家水平。

三看人才效能。武汉工程大学原副校长桂昭明教授通过对人力资本贡献率，以及从人力资源贡献率中分离出人才资本贡献率的测算，认为建设人才强国的目标可行：1978—2007年间我国人才资本贡献率约为17.03%，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到2020年，这一百分比有望达到35%左右。

“随着我国国力的快速增长，我国的国际地位正在上升。向世界宣布建设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我们有这样的自信。”这几乎是所有专家的共识。

(摘自2010年6月9日《人民日报》记者 董宏君)



“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加快人才发展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的重大战略选择。如果说在上世纪国际竞争主要是军事竞争、制造业竞争、贸易竞争、市场竞争、资本竞争，那么新世纪的国际竞争将更加集中在人才的竞争和高新科技的竞争。”著名社会学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分析指出，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制定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纲要》)，并提出“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人才并非少数精英之才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但这种比较优势还主要是建立在低成本上,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知识技术作用的日益增强以及我国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将难以持续。李培林认为,在今后的发展中,要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的素质,加快建立我国人才竞争的比较优势,逐步实现从人口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向人才强国的转变。

“加快人才发展,就要造就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这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统筹安排。”李培林表示,突出重点,就是要突出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重视培养领军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大力开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统筹安排,就是要统筹抓好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以及社会工作人才等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各类人才。

他告诉记者,从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和现实意义上看,人才的事情不是少数人的事情,人才不是指在芸芸众生之上的精英,人才就在我们身边,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有用之才。

《纲要》指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以人才并不只是少数精英之才,而是每一个普通劳动者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成为人才。”李培林说。

人才将成为改变农村面貌的生力军

此次纲要中提出要统筹推进各类人才建设,并提出了六大类人才建设。作为参与人才规划编制工作的专家顾问组专家,李培林表示,在各类人才建设中,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过去就比较重视,也比较熟悉。因此,他重点解读了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和社会工作人才的问题。

“农村实用人才”主要是指农村生产能手、经营能人、能工巧匠等,还包括农村里的教育、医疗和科技推广人员,近年来,这支队伍进一步扩展到外出务工返乡青年、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带头人和有

志于农村创业的大、中专毕业生等。

“不要小看这支队伍的作用,他们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变农村面貌的一支生力军。”李培林以农村大棚蔬菜为例指出,过去没有大棚蔬菜这项技术和该技术不普及时,北方城市家庭到冬天只能吃萝卜白菜,家家都储存很多大白菜,政府还要搞菜篮子工程。大棚蔬菜这样一项技术,也许并没有太多的科技含量,也没有什么高新之处,但它不仅改变了农村千家万户的收入水平,也完全改变了城市、特别是北方城市的生活方式。

李培林解释说,抓人才建设,当然要重点抓稀缺人才的建设,但稀缺人才,并不仅仅是能造导弹、火箭的人才,也应包括能发明、引进和普及像“大棚蔬菜”这样能改变亿万民众生活的人才。

我国同样需要管理和驾驭社会的人才

“社会工作人才”主要是指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者,但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也是指我国社会建设领域的人才。李培林认为,这是我国当前急需发展的方面。现在我国的干部队伍中,可以说70%以上都是比较熟悉经济工作的,这对实现发展的第一要务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的提高,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医疗、教育、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社会建设领域,也产生了一系列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度重视培养经济建设人才那样,高度重视培养社会工作人才。”李培林表示。

李培林指出,当前我国社会工作总体上与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要求还很不适应,社会工作管理人才仍然缺乏,在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中,具有经济工作知识的管理人才数十倍于具有社会工作知识的管理人才;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工作者队伍总量不足。因此,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不仅需要大量管理和驾驭经济的人才,也需要大量管理和驾驭社会的人才,特别是在城乡社区加快培养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李培林乐观表示,《纲要》的颁布,将为我国统筹推进各类人才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摘自2010年6月10日《光明日报》记者 赵达等)

愿处长们争做教授

汪强

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近140万名留学生，居世界之最，而归国留学人员不到三成。而美国《科学》杂志甚至把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2008年2月，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毅然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辞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施一公说：“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做科研，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

为什么国内不是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这并非笔者能说清楚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国内有一种不利于做研究的价值导向：一个人只有做了官，才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学校编校史，总是将学校里出了哪个市长、哪个书记作为自己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搞校庆活动，县长要比教授专家坐更重要的位置。当官者被认作是最重要的人才，因而各种待遇都要向当官的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安心做学问搞研究的自然减少了，出现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的情形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此，要想在争夺人才的“世界大战”中不打败仗，那就必须将目前的这种“做官第一”的价值观颠倒过来。据说，1940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拟设立民族学研究所，院长朱家骅通过总干事傅斯年邀请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于是傅斯年一再延请。到最后，惹得李方桂发了火，他毫不客气地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也许这一说法有所偏颇，但即使偏颇，这一说法流行总比当官第一的观念流行好。这种说法流行了，那就不会有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的位置，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情形，有40个处长去争一个教授的位子。

（摘自2010年6月3日《组织人事报》）

·相关链接·

中美欧日从事研究与实验发展的 科学家和工程师折合全时人员 (2000—2008)

单位：万人·年

	2000—2006年	2008年
中国	122.07	161.40
日本	78.05	
欧盟	129.81	
美国	140.27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WDR2009 相关数据计算

2007年人才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排名前20个国家和地区)

人才发展强国			人才发展中等国		
排序	国家或地区	评价分数	排序	国家或地区	评价分数
1	美国	1656.89	14	中国	193.95
2	日本	977.40	15	荷兰	184.08
3	德国	416.33	16	丹麦	173.19
4	法国	387.54	17	挪威	169.58
5	韩国	338.72	18	西班牙	166.76
6	俄罗斯	311.35	19	芬兰	165.42
7	英国	298.98	20	新西兰	160.63
8	意大利	295.02			
9	加拿大	207.09			
10	瑞士	203.34			
11	瑞典	202.27			
12	澳大利亚	201.86			
13	奥地利	201.65			

来源：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委托课题研究成果

城市文脉能延续吗

葛剑雄

城市的文脉是其生命力的体现

所谓城市文脉，就是指一座城市的文化及文化传统，而不是仅仅指当时存在的文化，因此与城市的功能是否延续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一方面是指现在的文化，一方面是指过去的文化，如果这两者是延续的，那就形成了一种传统。如果两者是不同的，或者以往有过这样的不同，这种传统就中断了，难以形成文脉。一座城市，尽管现在的文化很发达，如果过去的文化已不复存在，或者从来没有这样的文化，要形成文化传统必定要假以时日，形成自己的文脉更需要长期的积累和绵延。

另一方面，只有形成了自己的文脉，并且得到延续，城市的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有可能推到极致。文脉不仅是城市的基本设施、名胜古迹、文物遗址的积累，更是一代代城市人的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足以保持城市的记忆，提供调节人地关系和适应变化发展的经验。

但是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保持不变的功能。特别是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或者受到天灾人祸的摧残，一些城市的功能被强制改变，或者被破坏殆尽，延续数百上千年的文脉就此中断，幸而不绝如线，也已岌岌可危。

例如，三国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的都城建康（建业）作为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存在了三百多年，其功能基本不变，文脉得以延续。但到隋灭陈时将建康城彻底毁灭，将地区行政中心迁往别处，当地人口几乎全部外迁，这座六朝古都从地图上消失了。尽管以后的南京是在这片土地上重建的，除了战火毁灭不了的古代遗址遗物外，还有多少六朝遗风？

在以往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城市功能的同化、泛化，都要具有经济功能，要以生产为主；都要破旧立新，将传统当垃圾清除，立新却缺乏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又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急剧扩张和大拆大建，城市功能同化、泛化的趋势加剧，甚至盲目确保不现实的发展目标。大批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大量城市人口成为移民，能够传承城市文化的本地人口迅速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具有延续城市文脉的自觉性，不采取特殊的措施，文脉的断绝是不可避免的。

延续城市文脉需要保留必要的物，但更离不开能够传承文脉的人

正因为今天绝大多数城市的功能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原有的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加上中国有限的土地和庞大的人口，如果单从物质条件的需求看，城市多数原有设施的确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但为延续文脉着想，一座城市需要保存最低限度的古物旧物，才能保持城市的历史记忆。因为这些物曾经是城市多数居民的住所或活动场所，也是当时的文化和传统赖以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基础。如果让城市的后人仅仅凭着文字和图象去想像，大多数人是不能理解生动的历史，留下深刻记忆的。何况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居民的精神生活要求会不断提高，对国家和城市的记忆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这些记忆中还包含着我们今天不一定知道或理解的抽象的智慧和价值观念，原物的保存才能给后人以破解或汲取的可能。

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传承文脉的人，有了人脉才能有文脉。四合院的胡同、石库门（下转第37页）

中国文化产业“家底”大盘点

2004年，国家统计局牵头组成了课题组，提出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此分类标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统计的口径比较接近。在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和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中，也以此为标准，收集了大量文化产业第一手数据资料。

最近，国家统计局对这两次经济普查的数据进行了系统整理和权威解读，让我们从中了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轨迹，把握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脉搏。

文化产业“盘子”有多大

在经济普查中，国家统计局把“文化及相关产业”简称为“文化产业”，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按此分类，文化产业共有9大类和24个中类，包括国民经济行业中的99个小类。

文化产业的9大类别又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传统意义上文化产业为主的“核心层”，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为主的“外围层”，三是生产销售文化产品的“相关层”：

文化产业核心层——包括新闻服务，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四类；

文化产业外围层——包括网络文化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其他文化服务三类；

相关文化产业层——包括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两类。

旅游业是否属于文化产业？在文化产业的第六大类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中，有“旅游文化服务”，它包含旅行社、风景名胜区管理、公园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动物观赏服务等。

体育是否属于文化产业？美国体育业是被计算在娱乐产业中，而在中国的统计中，体育业没有被包含在文化产业中。

2008年的第二次经济普查中，进一步摸清了文化产业的“家底”：

单位数量增多；资产总量增加；发展速度较快。

值得强调的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对扩大就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其中“增加值”和“从业人员”两个指标最能体现文化产业对经济的贡献。

“增加值”反映的是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和贡献。2004年，文化产业中只有相关层的机制纸及纸板制造这一个行业小类的增加值超过200亿元。而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有10个行业小类的法人单位所创造的增加值超过200亿元。

“从业人员”反映的是对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程度和对就业的贡献。文化产业从业总人数不断增加，2008年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到1182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3.91%。

文化产业动力哪里来

文化产业的发展依靠文化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先行改革的行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产业发展进度也相对较快。比如，作为文化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出版发行行业是文化体制改革步伐较快、成效较大的领域，其市场化程度都较高——图书出版84.7%，报纸出版71.7%，期刊出版67.1%，音像制品出版88.0%，电子出版物出版91.2%。在第二届“文化产业30强”中，12家是出版发行业的龙头企业。

这些数据和事实，充分体现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成果。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大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所界定的45个文化服务业中，每个行业均有经营性产业活动和公益性事业活动之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核心层、外围层中的文化产品生产和销售企业以及相关层中的所有单位一般都已实现市场性经营。

2008年,这45个文化服务业中,经营性单位实现增加值2710.45亿元,公益性单位实现的增加值为928.62亿元,而2004年的经营性单位增加值仅为861.36亿元,公益性单位增加值仅为420.77亿元。这说明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在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方面成效明显。

2008年,我国文化服务业中市场化程度较高(90%以上)的有14个行业,分别为摄影扩印服务、广告业、其他计算机服务、旅行社、知识产权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室内娱乐活动、图书及音像制品出租、休闲健身娱乐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电子出版物出版、游乐园等。

市场化程度低于20%的有9个行业,分别为专业性社会团体、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群众文化活动、烈士陵园纪念馆、文物及文化保护、广播。这些行业也正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中需要政府大力扶持,保持其公益性特点的单位。

2008年,文艺创作与表演、艺术表演场馆等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比2004年有所提高,2004年均均在20%以下,现在分别为23%和32.7%。这些数据反映了这些行业改革的进展和成效。

相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些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对相关产业拉动作用会更大。

文化产业效益怎么样

近年来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大幅提高。

营业利润位列前6名的行业依次是:广告业(260亿元),其他计算机服务(112亿元),旅行社(110亿元),室内娱乐活动(61亿元),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56亿元)和图书出版(48亿元)。这6个行业的营业利润占全部文化服务业营业利润的66%。

当然,文化产业投资也是有风险的。出现经营亏损的单位占全部单位的比重达到1/5,其中规模以上文化产品生产企业的亏损面达到19.5%,规模以下为16.8%;文化服务业企业的亏损面为21.8%;限额以上文化产品批发零售企业的亏损面为19.3%,限额以下为28.6%。

挑战与机会并存,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是一块新的“处女地”,除了憧憬和激情,更需要理性,这样文化产业才会愈行愈健。

(摘自2010年6月16日《光明日报》记者张玉玲)

院士揭论文流失 “潜规则”

优秀论文先送国外

水平一般的才给国内期刊

科技期刊不同于一般的杂志,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创新水平的直接反映,是国家科技水平高低的晴雨表。有人甚至评价说,科技期刊之于科学研究发展就如同股市之于经济发展。朱作言院士的报告显示,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已由10年前占世界总量的0.2%上升至10%,现有科技期刊约4800余种,数量已为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我国科技论文数量可观,但大部分中国科技期刊却难掩文章质量不高、功利性强、国际影响力不大的无奈现状。

中国科协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科技工作者对国内学术刊物的水平评价并不高,67.5%的人认为存在各种问题,主要问题集中在版面费过高、文章质量差、发稿靠关系以及文章评审不透明。

对我国科技期刊的现状,中科院院士朱作言分析指出,一方面由于起步晚,缺乏国际学术影响力;另一方面是现行的科技评价体系鼓励优秀的国内科技论文流向国外期刊,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被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将有价值的科研论文先送到国外优秀期刊发表,水平一般的才送国内杂志,这几乎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潜规则”。这样的“潜规则”使得国内高质量学术文章大量外流,成为导致国内科技期刊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而期刊质量不高,权威性和影响力差,反过来又影响到高质量稿件的投递。

朱作言呼吁,要建立有利于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科研评价体系,倡导在中国科技期刊上首发国家重大科技投入的研究成果,展示国家科技专项的重大科技成果,最终办出知名的国际科技大刊。

(摘自2010年6月11日《北京晚报》记者蔡文清)

中国布局最大绿色投资

王仁贵 杨士龙

来自权威部门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在清洁能源上总共投资达346亿美元,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而美国以186亿美元退居第二。中国投资于清洁能源的总额几乎是美国投资额的两倍。而5年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仅为25亿美元。

从中央高层和相关部委获得的信息,大力推进绿色转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探索未来中国发展路径的高度统一的主张,有关绿色转型的战略布局正在形成。

抢占“绿色”能源“制高点”

中国对绿色经济的“制高点”——清洁能源——的发展,目前已经完成了具体的细化,表现为:

在水电方面,中国的水电资源技术可开发量大约是5.4亿千瓦,2009年中国的水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97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年发电量达6456亿千瓦时,约替代标准煤1.96亿吨,减排二氧化碳4.9亿吨。

目前中国投运的核电机组11台,共910万千瓦。中国正在建设山东海阳和浙江三门等第三代核电,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在建设三代核电机组的国家。

在风力发电方面,经过多年的培育,中国的风电发展开始进入了快车道。中国的风电装机规模连续四年翻番增长。据全球风能协会统计,2009年达到了2558万千瓦,居世界第二位。

太阳能方面,2009年中国光伏电池年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40%,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为世界太阳能光伏发电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国家能源局公开招标的甘肃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也正在建设之中。

生物质能方面,2009年全国户用沼气池300万户,约70亿立方米。按照有关部门的计划,今年新能源汽车要推广到20个城市。

一方面是产业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是传统高能耗行业的减停。中国积极采取措施优化传统高污染的小火电机组。2006年至2009年全国关停小火电机组606万千瓦,这个数字相当于英国的全部装机容量。形成每年可节约原煤64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6亿吨的能力。

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到15%左右,到2020年单位能耗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表示,到2020年,我国水电装机要达到3亿千瓦以上,每年可节约3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7.5亿吨;核电装机达到7000万千瓦以上,每年可节约1.8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4.5亿吨;风电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以上,每年可节约640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1.6亿吨;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每年可节约100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约2500万吨。

同时将大力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包括植物秸秆、潮汐能、地热能。

环保压力的“金刚石聚变”效应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指出,环境保护未来将着力从五个方面入手。

第一,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以绿色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发展绿色产业,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减少污染的先进

适用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物排放。

第二，深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以源头控制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严格控制“两高一资”行业盲目扩张，坚决抑制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第三，深入推进污染减排，以倒逼机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深入推进结构减排、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力争污染减排在实现既定目标的基础上取得更大成绩。

第四，健全并完善环境法规政策标准体系，以环境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深化绿色环境经济政策。

第五，增强环境科技创新和支撑能力，以市场导向发展壮大环保产业。

“十二五”期间，科技部将针对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的重大问题，重点推进三项工作：

一是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二是支持节能减排，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三是进一步加大投入，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寻找符合国情的绿色路线

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能源

研究会副理事长、能源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大地看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可能走发达国家走过的传统路线，尤其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创造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其一，加快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通过政策的约束和激励机制来增强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抑制不顾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和承载能力，盲目追求发展的短期行为，这也是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其二，把节约文化、环境道德纳入社会运行的公序良俗，把资源承载能力、生态环境容量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条件，进而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引导社会公众自觉选择节约环保、低碳排放的消费模式，推动经济持续、持久的复苏与发展。

其三，完善经济全球化机制，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环境。反对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在国际社会推动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绿色经济的理念，督促国际机构制定并实施鼓励绿色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

（摘自《瞭望》2010年第20期）

（上接第33页）和弄堂里必须有一些原来的居民，或者熟悉原来生活的居民后人，真实的历史和生活并非完全可以用文字或图像记录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居民完全有选择自己的居住方式和职业，如果需要他们为了传承文脉而发挥特殊的功能，政府和社会应该给他们合理的补偿和奖励。对一些传承特殊技艺或记忆的人，政府要保证他们衣食无忧，不断改善，而不能让他们去市场竞争。

这些物和人的保留必须用地方立法的方式加以保证，通过当地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监督，而不能根据长官意向随意变化，也不能因为主管官员的更迭而得不到稳定。

而要做到科学决策，就离不开一批专门的研

究人员，需要他们主要从事本城本地历史和文化的深入发掘、抢救、整理、研究和必要的普及。在城市新功能的建设和新文化的创建中，也要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采用他们的成果，使本土传统得到可能的体现，本土文化的元素渗透在新文化之中。

被延续的文脉并非一成不变，四合院不是北京自古以来的民居，石库门的原型来自英国，一百多年前才出现在上海，但谁也不否认它们在两座城市的历史地位。既然如此，只要文脉得到延续，今天出现在北京、上海的新事物，为什么不能成为未来城市传统的一部分呢？

（摘自2010年5月24日《人民政协报》）

毛泽东点评历代名相

杨天宇

点评曹操

曹操曾在东汉末年做过丞相。1970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此外，曹操在军事乃至文学艺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207年，曹操北征乌桓获得胜利，他在班师途中写下脍炙人口的《观沧海》。诗中说：“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1954年夏，毛泽东也写下一首词，就是《浪淘沙·北戴河》。词中提到：“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这里的“挥鞭”、“遗篇”四个字，就是对曹操文武兼备的肯定，而这种肯定是实事求是的。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明确提出“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次提到这两场战役。在这两场战役中，曹操都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袁绍，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但是，在赤壁之战中却为对方以少胜多，自己失去统一中国的机会。

点评诸葛亮

诸葛亮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名相，在历史上有重要地位。毛泽东在1943年11月29日指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后来，

他进一步强调：“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1947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出：“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说：“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

点评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的名相之一，同时在文学上也很有成就。《苏幕遮》和《渔家傲》，就是范仲淹所写的两首词。1957年8月1日，毛泽东对范仲淹的这两首词做出如下评注：“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

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毛泽东对范仲淹两首词的点评，流露出真挚的个人情感。还需要说明的是，范仲淹作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强调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这样的精神和胸襟，毛泽东是赞同和欣赏的。

批评李林甫

在众多名相中，部分人与范仲淹这样的人相反，他们有的不学无术，有的虽然有一些或很多才华，但是干尽坏事、残害忠良、祸国殃民。对于这些人，毛泽东给予了尖锐的抨击。李林甫曾在唐玄宗时任宰相，这个宰相可谓臭名昭著。《资治通鉴》中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1939年12月20日，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但是，谁是朋友呢？毛泽东指出：“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李林甫之流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点评谢安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到了淝水之战。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次提到这个战役。这场战役于383年发生在前秦和东晋之间。前秦方面的最高统帅是秦王苻坚，东晋方面的最高统帅实际上是宰相谢安。苻坚依仗优势兵力，看不起晋军。晋军打败秦军的前锋，在

淝水同秦军对峙。苻坚看到晋军布阵齐整，又以为八公山上的草木也都是晋军，于是开始害怕。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在两军隔淝水对峙时，晋军要求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后决战。秦军同意后退，而晋军乘机进攻，取得胜利。毛泽东认为，秦晋淝水之战属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晋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宰相谢安攻不可没。毛泽东之所以反复提到淝水之战，意在激励全体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和全国人民，坚定革命信心，争取最后胜利。

点评姜子牙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提到了姜子牙。姜子牙辅佐周武王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这个故事在《封神演义》中被写成神话。毛泽东说：“《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着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在这里，姜子牙与申公豹是人品完全相反两种角色。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又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这里说的“太公”，就是姜子牙。据传，姜子牙曾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三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钩来！”在毛泽东的这些言论中，前后出现性质相反的两个“姜子牙”，但 these 言论都是为现实服务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摘自2010年6月10日《团结报》）

周恩来怒批部长

佚名

1. “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

周恩来面对那些与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部长们时，一向表现得非常严肃、要求很高。

当时，一些部长呈送上来的材料，不乏一些数据性错误。遇到这种情况，周恩来会忍不住当众让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个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问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一同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见了如此阵势，严肃批评说：“这是做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一通：“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許的！”

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正襟危坐、全力以赴、紧张专注的神情。有一位部长在汇报工作时，只是照着材料一个字一句话地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之故，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念错了闹出笑话来。

周恩来开始还能强压住内心的火气，提醒说：“不对！看清了再念。”那位部长红了脸，眯细眼睛又看着念一遍。再继续下去，情况依然糟糕。“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很恼火地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然后，周恩来随口说出了相应的准确数字。其他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后来，周恩来问那位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

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忙解释道：“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2.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这时，突然接到一份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周恩来读着这份电报，陷入了沉思：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未明朗。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经过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先留在开罗进行访问考察，以便观察形势变化，另作进一步的打算与安排。

在周恩来之前，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到达阿尔及尔。许多亚非国家都对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所以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周恩来。

“总理，我来了。”

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很深，随意得多，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周恩来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他“砰砰”敲了三下桌子，气愤地大声说：“这是不允许的！”

陈毅羞愧不已，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得更紧，站得更加挺立。“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低声而发自肺腑地承认错误。

“就这一句就完了？”周恩来转过身来，犀利的目光逼视着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周恩来的声音很少这么大。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着陈毅，声音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待陈毅走了之后，见周恩来心平气和了一些后，周恩来身边的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免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其中一位秘书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这时的周恩来气已基本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

3. “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有一次，周恩来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宴会的气氛热烈而友好，可当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的时候，忽然大厅里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多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在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可宴会结束之后，周恩来根本没有马上提断电的事，回到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像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却不料想，凌晨3点钟周恩来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工作人员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接到通知，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到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周恩来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与会者个个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周恩来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了不同的批评，并一起研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措施。

在追问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陈家康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一句话说得周恩来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周恩来看看大家，又看看窗外，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周恩来用指头在空中敲敲，“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

（原载2010年6月2日《党史信息报》）

中国军队要学会打“全球战争”

韩旭东

军事发展，如今到了“全球化战场”新时代。

所谓全球化战场，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某军事安全问题被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关注和参与。比如，参与阿富汗战争的国家已达43个，针对的目标仅仅是65万平方公里的阿富汗境内为数不多的恐怖组织。当前，仅对付亚丁湾索马里海盗，全球大约就有几十个国家参与。二是全球正成为一个战场。首先，美国已经将全球视为一个战场。2003年4月，美国空军就提出要具有“全球瞬时打击能力”。2009年初，美国空军宣布成立“全球打击指挥中心”，落实“一个小时打遍全球”的计划。其次，网络战已使全球化战场第一次变成现实。今年5月21日，美国网络司令部正式启动，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网络战，并在网络上展开进攻行动。网络这个第一种全球化战场，硝烟已经燃起。

在全球化战场这个新时代，我们的军事思维面临巨大挑战。首先，是否要搞军事结盟？在全球化战场时代，我们会发现，针对某个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以“盟友”或“伙伴”为名结成“联盟”采取行动。针对阿富汗的塔利班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北约安全援助部队”除北约成员国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以“伙伴”的名义加入。冷战后，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几乎都是拉着盟友或伙伴行动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结成军事联盟关系的盟友。可以设想，一旦出现“事情”，中国将可能面临“陷入孤立的窘境”。所以，面对全球化战场，中国也应该寻求建立某种形式的军事伙伴，以摆脱可能的“孤立”地位。

其次，是否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全球化战场的特点就是在全全球范围内行动。目前，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出印度洋的亚丁湾护航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补给。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本来可以依靠美国基地实施补给的，为什么还要以亚丁湾护航需要为由，在吉布提独自建立海外基地呢？实际上，日本也想构建自己的全球军事行动体系。在全球化战场

新时代，中国军队要想在全球行动保护国家海外利益，也应该建立全球军事“支持体系”，以有利地维护国家海外利益。

第三，是否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历史上，许多问题的解决往往要求助于军事这张“牌”。切记，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手段要最后才使用。朝鲜战争、中印边境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我国果断地适时出兵，最后取得了有利于我方的“解决”。对于车臣问题，俄罗斯果断地使用了军事手段，遏制了车臣的分离与独立。中国军队也应该在有利有理的情况下，对一些公然的挑衅和侵犯我国领土领海主权的军事行动采取必要的反击，适时显示军队的威力，以起震慑之效。

第四，如何检验我军作战能力面临挑战。冷战后，世界上主要军事大国军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过战争的洗礼。美国军队打的战争最多，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军队也多次参与过海外军事行动。日本自卫队借着给美军提供后勤支援、亚丁湾护航等理由也走出国门亲身体验战火的硝烟。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与巴基斯坦军队经常“练练身手”。在大国军队中，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只有中国军队没有闻过战火硝烟。通过日常的军事训练、实兵演习、计算机模拟等手段可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但这些手段与战火对军队的检验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全球化战场的出现，中国军队应该从打局部战争向打“全球战争”的方向转变。这也是保卫我国海外利益的需要。对此，中国军队应该从思想上迎接“全球化战场”的到来。其次，中国军队应加大国际军事参与力度，将自己融入到国际军事舞台上去。再次，中国军队要定位好自己在全球化战场中的角色。最后，中国军队要切实做好应对全球化战场带来各种挑战的准备工作。随着海外利益的拓展，我国军队应该具备在全球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能力。

（摘自2010年6月12日《环球时报》）

周边海军加快巨舰建造步伐

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造舰运动”已经缓缓拉开序幕。

最近，日美两军达成协议，将在第一岛链上加大对中国海军舰船活动的监控。其实，日美等国的动作不仅仅是监控，它们正在加紧建造巨型军舰，以确保自己在太平洋以及世界其他海域的绝对军事优势，而它们渲染中国海军威胁只是这些造舰计划的烟雾弹。

美国：力保绝对优势

2009年，美国海军最后一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乔治·布什”号正式服役。与“乔治·布什”号同一年建成，并交付美国海军的还包括其他10艘大型舰船。

2010年仍在美军船坞中建造的大型舰船还有19艘：“杰拉德·福特”号航空母舰，6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2艘“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6艘“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4艘“圣安东尼奥”级直升机船坞登陆舰，以及第一艘JHSV-1快速运输船。

当然，以上仅仅是美国海军“30年造舰计划”的一小部分，按照2006年制定的“30年造舰计划”，美国海军将在2037年前拥有最少313艘舰艇，其现有的11支航母打击群、12支两栖戒备群和7支水面作战群，扩充为32个海上独立打击群，包括11支航母打击群、12支远征打击群、9支水面作战群。

确保拥有一支压倒性优势的海军舰队，仍将是美国政府始终坚持的目标。

俄罗斯：恢复昔日雄心

相对于美军造船厂，2010年的俄罗斯船厂也毫不逊色。目前，共有38艘、25个型号的俄罗斯海军新型战舰、潜艇、辅助船正在16家造船厂开工建设，其中作战舰艇20艘。

按照《俄联邦海军未来发展规划》，预计到2025年左右，俄罗斯海军将拥有300至320艘现代化作战舰艇，其中包括4至6艘航空母舰和95艘潜艇，战力将超过前苏联鼎盛时期。俄海军将重新具备全球远洋作战能力。

印度：进口大量装备

为了实现印度海军“西出、东进、南下”远景目标，即全面控制印度洋、东进太平洋、西出大西洋、南下非洲。近年来，印度不惜投入巨资大规模购入和建造具备远洋持续作战能力的战舰。

根据规划，到2017年，印度海军拥有的舰艇数量将由目前的140艘增加到185艘。未来印度海军仍然要大量进口昂贵的装备，以支撑其称霸印度洋的庞大海军计划。

日韩：低调碎步快跑

与大张旗鼓的印度不同，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悄悄地”实现扩张。满载排水量18000吨的“日向”级直升机航母、满载排水量近万吨的“宙斯盾”级导弹驱逐舰、1.6万吨的大型远洋补给舰，这些足以组建一支航母战斗群的大吨位舰艇，正一艘接着一艘的加入日本海上自卫队。

在未来几年内，海上自卫队还将完成“亲潮”级替换“夕潮”级的工作，其潜艇数量将迅速升至20艘左右。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研发的“下一代高科技潜艇”，预定2016年加入自卫队序列。

而韩国虽然国力小寡，但也要求自己海军力量达到日本的70%~80%。

面对周边国家掀起的一轮又一轮造舰高潮，本身就处于不利海洋地理环境中的中国海军，无疑将面临更大压力。水面舰艇大型化、作战半径远程化、潜艇核动力化，周边海上力量的不断扩充，将迫使中国海军不得不加速现代化步伐。

（摘自2010年6月10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海韬）

看马英九执政两周年

徐青

2010年5月20日，马英九执政整两年。

马英九以“大步向前，开创黄金十年”为题，向岛内人民做出“期中总结”，其中，有施政成果，有未来愿景，也有对这两年施政的检讨。他至今仍在民望的低谷区坚持着自己的方向和目标。

方向一：

两岸与对外关系的“良性循环”

完成对“台独”执政的拨乱反正，让两岸与对外关系呈现“良性循环”，是马英九为自己任期定下的两岸与对外关系上的方向和目标，也是马英九在两周年记者会上所谓“和平护国”的愿景。

李登辉、陈水扁近20年“台独”执政结果是：两岸不和平、经济大衰落、国际不买账，台湾政治、“外交”、经济利益全面陷入危机与边缘化。这使得长期以来国民党在台湾打下的基业，那些始终被视为优于大陆、可抗衡大陆的政治、经济筹码快速流失，而与此同时大陆的国力迅速崛起，两岸优劣态势逆转，作为“中华民国”的忠实捍卫者，马英九既不甘心也很着急。因此，他要力争八年任期，并利用这八年完成对“台独”执政的拨乱反正，达成两岸与对外关系的“良性循环”，重振台湾失去的竞争力。

对马英九来说，两岸关系的终点在哪里不是他要解决的问题，他也难以解决，他能肯定的就是两岸关系是台湾所有问题的症结，因此，政治、经济、“外交”困境，都要从两岸关系正常化来着手化解。为此，他营造两岸和平环境，维持“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的‘不统、不独、不武’”状态，并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他认为，“两岸关系改善有益国际关系拓展，而国际关系的拓展，又会让台湾对深化两岸关系更有意愿及信心”，这就

是“良性循环”。

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下，台湾与大陆实现“大三通”，开放陆客观光，扩大并深化各方面的交流，签订ECFA等经贸协议，在两岸“外交休兵”下进行“正常外交”，稳固“邦交”，恢复台美互信，并扩大国际活动空间，等等，就成为马英九施政的主要目标。

方向二：

建构新的岛内政治文化模式

以八年任期奠定新的政治文化模式，是马英九的另一个执政方向。马英九在两周年记者会上所谓“文化兴国”的愿景，就隶属于这个方向。“以文化发扬台湾优势，让台湾特色文化软实力感动世界”，是这一愿景的基本内容。台湾的“优势文化”在哪里？就是马英九所谓的“民主政治”。但台湾民主政治的恶质形象屡屡通过媒体散播出去。

马英九对国民党黑金政治、官僚腐化、派系倾轧极不认同，因为马英九的政治文化与国民党政治文化大异其趣。马英九的政治文化，原则上讲求清廉自律，不搞派系、没有人情包袱，没有利益交换，一切依法依程序办理，而国民党内目前仍盛行私相授受、利益交换、“乔”事情的政治文化习气，这样的党当然不能完全配合马英九的施政步调，也正因此，马英九历来高举国民党改革的大旗。可以说，马英九的政治文化与运作模式与马英九的施政必然是一体两面，如影随行。以新的政治文化建构新的政治运作机制，是马英九顺利推动政务，保证执政正当性的政治基础。此外，“廉政风纪、守宪不滥权、中道不操弄”，“坚持领导正派、干净政府”，必然是马英九整顿吏治、重建政治道德的目标。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据《联合报》趋势数据显示，马英九上台以来，

声望由就职初期的66%一路下滑,2009年执政周年时虽回升至52%,但在“八八水灾”后,满意度重挫至29%,此后一直维持在30%左右的低迷水平;3月18日当选两周年前夕,马声望未见起色,好评更降至27%的新低点。4月底“双英辩”会后,好评上升到38%,这次就职两周年的调查,马声望变化不大,满意度为39%,是近一年来最高点,不满意比率则维持43%。

可以说,66%与27%之间的落差,正体现了马英九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这个差距的原因何在?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

其一,马英九及其团队作为政治人的先天缺陷。从马英九上台的第一刻起,民意对他的要求就有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从清廉正派的形象认同转为寄望施政绩效之达成,亦即其施政能力开始接受民意的检验。但马英九团队中多学者清流,擅理论而拙操作,缺少政治权谋,思虑欠周,自我感觉良好而忽略沟通,政治警觉性、敏感度都不够,危机意识不足,危机处理上常常被动,两年来在“毒奶粉”、“八八水灾”、“新流感”、“美牛进口”以及ECFA签订与否等事件上频频发生领导危机,让民众感受不到其执政能力。

其二,改革初启,阻碍重重。这点在国民党的几次地方败选上最为凸显。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直接目的就是党务革新。然而,两年来,虽然从县市“立委”补选、国民党中常委选举中都看得到改革的影子,但是也暴露出一些地区的改革无效与阻力,改革代价沉重,似乎彰显着国民党的政治文化已经恶劣到极致,虽然马英九咬牙踏上改革之路,但积重难返,任重道远。

其三,民心焦虑不满。这种焦虑一方面指向经济没有“马上好”,一方面指向马英九的“全民总统”理念。历经多年社会动荡、经济衰败,民众的生活品质大为缩水,对执政当局的不满已到心理承受能力的临界点。在马英九竞选口号“马上好”的一再鼓动下,民众期望自然高涨,马英九也以民生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经济发展为首要指标。但是,马英九团队高估了松绑两岸经贸的初期效益,未料

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突然袭击,“马上好”变成“马上不好”,民众的耐心终于崩溃。此外,马英九对“扁案”的坚持不介入,对绿营人士的任用,做“全民总统”的“雄心”,加上蓝营高层以及各党间的权力竞逐、牵扯,都难以平息深蓝支持者多年来蓄积的委屈,有违深蓝支持者的意愿,因此,基本盘有所疏离。

其四,在野党毫无理性的“打马”,手段相当阴毒。一方面,马英九施政的诸多缺失让民进党抓住了把柄,使其毫无理性的“打马”操作既有了“民意的基础”,也引导了“民意认同”。另一方面,民进党为了一党之私,高举所谓“台湾主体意识”,说马“对于中国极尽卑躬谄媚之能事”,把其两岸、“外交”政策扭曲为“矮化主权”、“出卖台湾利益”、“外交休克”,恐吓民众“ECFA是典型的包着糖衣的毒药”,说马的改革“拢是假、骗很大”,将马及其施政团队涂抹成“无能”之辈,甚至让“无能论”弥漫整个社会,更将马执政这两年说成是“崩溃的两年”,所有这些都旨在从根本上动摇民众对马的信任和信心,也实际上蛊惑、蒙蔽了不少不明就里的民众。

“改变已经发生”

看马英九执政两周年的讲话,可以鲜明地感受到马英九对理想的坚持并没有因此而懈怠,他仍要全力推动台湾迫切需要的改革,仍要全力以赴地实现他心中的台湾愿景。当然,《联合报》的民调也显示,50%的民众肯定马英九的能力,58%的民众信赖马英九。

马英九自称,他是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历经两年的执政风雨,马英九对岛内政情与现实有更加深刻的体认,对自己和团队的个性弱项有了更加分明的认识,从幕僚与行政团队的人事异动来看,马英九正调整个人风格与团队特质的取向,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马英九目前的低分数只是其执政的必经过程,而非最终的执政败果。正如马英九自己所言,“改变正在发生”,未来的两年才是马英九执政成败的关键。

(摘自《世界知识》2010年第11期)

瑞典纪行：“创新之国”源头探秘

余瀛波

无处不在的瑞典创新

谁能想到，直到上世纪初时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仅仅在一个世纪后，便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而当人们找寻瑞典奇迹背后的奥秘时不难发现，这种成功与瑞典人对教育、科学和创新的推崇密不可分。

多年以来，瑞典一直是公认的最具创新力的国家，同时也是诸多全球创新研究报告排名中的佼佼者。2008年，根据欧盟委员会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瑞典是最具创新能力的西方国家，其表现不仅超过其他欧盟成员国，也优于美国和日本。2009年，在欧洲委员会发布的一项包含29项不同指标的欧洲年度创新评分板中，瑞典蝉联欧盟中最具创新性的国家。

一百多年以来，瑞典共有30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瑞典人发明的摄氏温标、伽玛刀、心脏起搏器、血液透析机、无菌纸包装技术、滚珠轴承、拉链、安全火柴、现代电话交换机、现代单体式电冰箱、家用真空吸尘器、移动电话通信技术、三点式安全带、鼠标、网络电话Skype等都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推动了工业文明的发展。

统计表明，就人均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而言，排在世界第一位的是瑞典。而在全世界每百万人拥有的专利数量上，瑞典接近370个，与之相比，美国还不到150个。

创新来自于开放交流

初至斯德哥尔摩，探访的第一站就定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它既是每年诺贝尔物理学和化学奖

的颁发机构，也是瑞典最高的学术机关和最大的科学中心。

不到早晨八点，记者一行人就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而此时院长林奎斯特先生已经一个人在学院内等候我们多时。宁静清幽的办公礼堂内握手寒暄，丝毫没有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委员的高高在上，没有科学巨人的严肃冷峻，甚至不需要任何助手相随左右，有的只是诺贝尔式的坦率真诚与宽广胸怀。

在这座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皇家科学院内，林奎斯特院长亲自为我们逐一讲述它的历史与荣耀。记者问道，“身处瑞典创新的金字塔尖上的您，认为瑞典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创新力？”院长答曰：“自科学院1739年成立以来，就在不断地挖掘科学技术，不断地研究探索。我认为，诺贝尔奖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提升在世界科研领域中的地位，为瑞典在世界上的地位提供了很大帮助。因为有诺贝尔奖，所以我们的科学家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世界接触，我们的科学院院士有机会到世界各国去吸收先进的经验，同时在我们这里举办研讨会，吸引各国的科学家到这里来进行研讨。”

而对于“中国何时才会有人获得诺奖”的问题，林奎斯特院长答道，“一般诺贝尔奖都是在一些科学成果获得了承认十几年之后，才颁给它们的发明者这个奖项，而中国改革开放是1978年，到现在也只有30多年时间，所以要求现在就出诺贝尔奖获得者，可能还早了点。”也许，中国的科研从业者们，需要的只是再多一些时间和耐心。

需要注意的是，“诺贝尔奖最重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奖励人，而是为了奖励新事物的发现，新的发明创造，奖励给改善人类环境作出贡献的发

明，然后在发明的背后再找出其发明者。”林奎斯特院长强调说。

研究成果要转化成生产力

当地人将斯德哥尔摩称作是“北欧的首都”，而位于城中的“西斯塔科学城”则被称作是北欧的“麦加”。这是因为，西斯塔是北欧乃至世界信息及通讯技术领域最大的几个商业研发区之一。

作为瑞典经济发展最强盛的地区，有 310 万人住在这一地区，也就是说，差不多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于此。这里有 1400 家公司，其中 500 多家是属于电子通讯行业，工作人员超过 35000 人，世界知名的电子通讯领域巨头爱立信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另外，这里还有两所著名大学（皇家理工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及多个科研基地，有 1000 多名教授，如果以平米来计算，堪称是世界上教授密度最高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学术和商业同等重要。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地方建成一座城市的样子，而不只是一个技术研发基地。”西斯塔的工作人员这样告诉我们。

而为了鼓励与促进创新，瑞典政府更是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的协调机构——国家创新署（Vinnova），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致力于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研究与开发，促进研究与开发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从而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创新署署长布罗根女士说，瑞典国家创新署主要负责协调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间的合作。“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工业界人士、国家机构人士和大学机构人士三方召集起来，共同制定一个计划，来促进国家研发的发展。总之，我们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在整个欧洲内部，对政府和企业（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公司和企业）提供信息和指导。”

创新也可以是一种生态理念

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来说，低碳和环保都是一个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新理念。殊不知，瑞典

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对影响到今天的气候问题具有了忧患意识。1972 年 6 月，正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会上发表了闻名于世的《人类环境宣言》，从此拉开了全球环境合作的序幕。

令人深有启发的是，这种对未来的前瞻性见识，反过来同样能够给瑞典带来商业竞争上的优势。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长期以来，瑞典在贴有生态标识的商品和服务方面一直领先全球。1985 年，瑞典为有机食品设立了 KRAV 标识，以帮助消费者做出环保的购物选择。贴有这一标识的商品必须满足一定要求，即不得使用化学农药、化肥或转基因微生物。

近年来，瑞典还有一个世界最大规模的体现生态城市理念的哈马碧生态城，正成为全世界建造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低碳示范社区。该地区过去曾是一处非法的小型工业区和港口，有许多搭建的临时建筑，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土壤遭受严重的工业废物污染。

建成后的哈马碧社区，完全体现了社区的居住功能与环境的和谐共存，生物气体及其转化的电力成为这座社区能源的主要来源。小区附近有一个热电厂，热电厂的部分原料就是利用小区居民排放的有机废物，循环利用后再将电能送回小区，小区里所有公共交通燃料都是这个电厂生产的，同时小区还使用太阳能和风能，使整个小区可以达到零排放。在哈马碧各种环保手段中，高达 95% 的家用垃圾循环技术是最值得借鉴的地方。2010 年，斯德哥尔摩被欧盟授予首个“欧洲绿色首都”，这其中自然也有哈马碧的一份功劳。

瑞典作为“创新之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创新既可以是一种将知识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经济原动力，也可以是一种让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前瞻性眼光的生活方式，更可以是一种影响到我们子孙万代的生态理念，而只要你真正领会了创新的精髓，创新就将无处不在。

（摘自 2010 年 5 月 25 日《法制日报》）

美国大学靠什么保障教学质量

赵琳

教育质量自我保障制度是美国大学保持其高水平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育质量评估与保障制度，人们可以发现美国大学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伯克利的教育质量自我保障制度集中而具体地体现为学校定期开展的院校自评工作。根据其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面向社会问责的院校自评。其具体形式是，由加州大学总校统筹汇总各分校的信息，完成并向公众发布年度问责报告。围绕着15个一级指标、131个二级指标写作完成。指标体系涵盖本科生学业完成情况、经济支付能力、入学机会、背景信息、就读经历，研究生学业情况，教师和职员情况，科研情况，图书馆发展，大学排名，预算与财务，校园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卫生科学与医疗服务，继续教育等内容。面向社会问责的院校自评工作有如下特点：由大学（总校）自己完成评估；大学主动面对公众的质询，以“效率与公平”作为评估的原则，目的是赢得公众和社会的支持；以展示成绩为主，着眼解决的是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完备的指标体系，涵盖内容极其广泛，并以定量指标为主，旨在以具体的统计数据说服公众，全面展示学校开展的工作及其对社会的贡献。

二是面向认证的自评工作。在伯克利，面向认证的自评包括两种：一种是以学校整体为认证对象的院校自评，另一种是以某院系或专业为认证对象的院系或专业自评。伯克利的院校认证是交由美国西部院校认证协会来完成的，每十二年进行一次，认证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其核心环节即为院校自评。院校自评有其自身的指标体系，具体内容包括院校目标与教育目的，院校核心功能，资源与可持续发展，规划、评估与改进。面向认证的院校自评工作是作为专业协会认证的首个也是最为核心的环节来进行的；一般来说，目的是获得专业资质认可，

但像伯克利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希望通过自评发现学校存在的问题；整个自评分为三个阶段，基本路径是，收集基本的描述性数据——重点关注和分析学校发展能力——重点关注和分析学校的教学效果，逐步深入地形成三份评估报告。其指标体系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但随着关注内容的逐步深入，越发以定性陈述为主。

三是面向自我改进的院校自评。其目的是评估和改进系所的教学与科研情况。评估的重点是提早规划，分析近期发展趋势，以及确定自身发展方向。中心环节是系所自评，自评既是一次充分表达系所独特文化的机会，也是一次总结成绩、反思过去以及批判性地评估其学术发展方向的机会。评估需要聘请外部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要对系所进行实地考察。自评报告的撰写是系所或专业评估的核心环节。自评报告将使命和战略、师资情况、科研、本科生培养以及研究生培养作为核心问题加以重点分析，除此之外，也对职员、设备及其他资源、管理情况进行考察。仅以师资情况为例，自评报告不再进行教师数量、年龄、学历、学缘、获奖情况的数据统计，而是聚焦师资的聘任和配备、师生互动、对教学和科研的投入及其质量保障、跨学科学者间的互动及效果等系所或专业发展的核心内容。

伯克利还利用自行开发的调查问卷每年对学生就读经验调查项目。这一项目代表了院校自我改进的新的发展方向。就评估主体而言，如果说系所或专业自评最突出的特点是由教师主导，那么这一项目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以学生为中心，在进行教育质量评估的过程中，倾听来自学生的声音。另外，它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强调学生的学习结果；作为测查教育效果与教育目标是否匹配的一种手段，与系所或专业自评配合使用。

（摘自2010年6月13日《光明日报》）

优先投资人的发展——

人口素质是国家强盛、繁荣的决定因素

中国国情是什么？怎样认识我国国情？《国情备忘录》围绕当前我国人口、“三农”、耕地保护、资源环境、社会保障以及创新能力等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通过专家评论、百姓感受以及典型案例，全方位、多角度地描述了真实国情，为我们深入了解、准确把握国情提供了一本生动教材。现摘录书中一节以飨读者。

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还处在世界产业分工链的低端，这也是由中国的人口状况决定的。我们要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但我们也要在国情面前怀着一种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的心情选择我们要走的道路。

人口规模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人口问题上，如何把数量转化为质量，对于中国发展更为重要。

新中国在提高人口素质方面取得了种种成就。然而，中国目前高素质人口比例仍然偏低。目前中国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的人口比例只为美国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中国人口素质这些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的人口，每十万受教育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印度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技人员，在每千人当中的比例还是很低的，中国每千人当中从事研究和开发，我们叫R & D，这个工程师和科学家只有0.5个，日本是5.1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人口素质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靠这一小部分人，去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车，可以想象，这会有多么吃力。

民族能不能发展，国家能不能强盛，民族能不能繁荣，人口多少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而人口的素质才是决定因素。

当中国制造努力摆脱原来小作坊式的生产，试图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时，中国的企业家却蓦然发现，自己企业里最基本的员工素质，离想象中还有相当的距离。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俞尧昌非常苦恼：“因为质量都是工人制作出来的，产品是制造出来的，不是检查出来的。而制造的过程，你可

以去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装备，全是世界一流的，那一流的装备就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工人去操作它。如果素质不到位，很好的装备也不一定生产出一流的产品”。

十年前就定位于世界名牌制造中心的格兰仕，这些年来，人的问题一直是它的切肤之痛。格兰仕缺的不仅是高素质的技工，还有高素质的工程师。格兰仕一度认为，只要从国外引进了一流的技术和生产线，就能生产出国际一流的产品，事实却令他们失望。同样的流水线，同样的材料和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依然在工艺上存在差距。

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其国民素质，包括健康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养，可我们在很多方面越来越受制于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这样一个国情，出生缺陷、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几亿之众！所以我们只能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低素质人口比重过大，大大地摊薄了我们的经济收益率，而且不断地加大我们的经济成本。人力资本跟物力资本、金融资本一个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它即使不生产，它依然在消费。不是先进生产力，就是落后生产力，甚至是破坏力。

而且，“人口红利”这曾被世界艳羡的字眼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曾经有人会自豪地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丰富的大国，我们永远消耗不了我们的劳动力，但是现实正在不动声色地结束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刘易斯转折点，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会经历二元经济蜕变的发展过程，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化必需的廉价劳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工资增长缓慢，雇用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差距

扩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最终会从无限供给的状态向短缺状态转变，并实现质的飞跃，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劳动力由廉价向昂贵迈进，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语境也将改变。

亚洲开发银行在《2008年亚洲发展展望》中警示，中国的劳动力面临三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消失，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短缺制约了企业制造水平，以及结构调整等问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近年来，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现象逐渐由沿海向内地蔓延，甚至到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可能转变成“人口负债”。

在中国农村，还有一半的劳动力没有念过中学，全中国的文盲已经超过1个亿。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靠什么来实现，最起码要给他一种基本的工作技能。所以中国不存在劳动力总量不足的问题，短缺的是有技能的、有熟练技术的劳动力。

二战后的日本，物质资本几乎荡然无存，但其国家财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具有知识水平的人大量存在，这促成了它后来的崛起；美国南北战争以后，大力发展职业中学，也造就了一批实业家和发明家。第一架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就是其中之一。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十分重视人口科学，培养了大批高端人才。所以说，人口能不能科学发展，这涉及一个国家的人口安全意识和战略意识。

人口专家邬沧萍以印度为例，为我们上了一课：“为什么印度里面，IT软件确实实在全世界独一无二，我们叫世界的工厂，人家叫世界的办公室，人家在这点上，它的文化素质，它的英语水平，显然还有一点，在国际公务员，印度就比我们多，什么道理呢？你看联合国，哪一个国际机构里面，印度的人都多。”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中国要想创造出美国这样的GDP的总量，中国不需要13亿人就应该能创造出来。美国只有3亿人就创造出来了，当然你说中国在一个发展过程当中，现在达不到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但至少就是说，在这里面你能不能创造出你国家的竞争力，你民族的发展，国家能不能发展得强盛，民族能不能发展强盛，人口多少不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技术水平，科技，人口的素质，才

是决定的因素。

2006年，中国发布了建国以来第一份人口战略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

优先投资于人的发展，是我们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目标。我们试图以现代化为课堂，以排山倒海的磅礴，把国民推入提高素质的浪潮。但现实告诉我们，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揠苗助长。

1979年我国农村改革以前，很多地方已经普遍地使用抽水机、拖拉机、插秧机、打谷机等农业机械，看上去机械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中国的多数农民仍然吃不饱饭。1979年，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政策，虽然绝大多数农民凭借一家一户的经济实力购买不了农业机械，他们只好改用很原始的“水车”抽水，用牛耕地，用手插秧，用人工脱粒。但奇怪的是，科学技术在广大农村的应用普遍倒退的198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有了显著的增长，大部分农民一下子就解决了温饱问题。直至今日，大多数的中国农村还是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耕作方式，但绝大部分农民却能丰衣足食。

很多地方公共汽车实行了无人售票，据说公交车无人售票属于“与国际接轨”。可是，由于实行无人售票，整座城市因没有了售票员而少很多就业机会。欧美等发达国家劳动力紧缺，无人售票是他们明智的选择。可是依照我们的国情，有什么理由步人家的后尘？

如果我们单纯以农业机械化、无人售票等现代化方式，把劳动者挤出粗放型产业，强迫他们在阵痛中蜕变。我们会悲哀地发现，我们无法给他们提供额外的工作机会，这些被挤出粗放型产业的劳动者，涅槃过后，不是重生而是迷茫。

优先投资人的发展，步子不能迈得过急，过大，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需要本土化，更需要原创。但无论如何，唯有建设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才能提高人口素质，从人力资本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这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从现在开始的未来三十年，中华大地上还将新增2亿人口，还将有3亿农民要从农村走向城市。这意味着，至少有5亿中国人需要在有限的国土空间上重新布局。

（摘自《国情备忘录》中央电视台《国情备忘录》项目组著，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干部讲话应有 “百姓思维”

简满屯

干部的讲话最能体现文风，改进文风要先从改进干部的讲话风格开始。

现实中，一些干部的讲话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一种能应用于任何情况的模式和套路，一定不是适合所有情况的模式。

人接受一种思想，认识一种事物，先是接触具体的东西，有了感性认识，进而才能产生理性认识。所谓动之以情在先、晓之以理在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干部讲话，很多时候却违背了这个道理，上来先讲一大通抽象的理论，这样一开始就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怎么能拉近与听众的心理距离，怎么能不与听众产生隔膜？

有些干部讲话，往往唯恐高度不够，拼命运用哲学原理构建讲话框架，忽视了由感性到理性的规律。注意力常常放在上级领导讲过的观点上，提法往上级领导讲话上靠拢，却很少能把握百姓的思维规律，这种站在高处向下俯视行文的思维模式，当然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

现在的受众，面临很多选择，可以上网、看电影、去读书，很难主动坐下来吸收这样的讲话内容。即使他是你直接下属，被要求坐在台下听你的讲话，也不见得就听进去了，除非你的讲话很有感染力，能引起他的共鸣。一些干部讲话时，坐在下面的同志拿出一个笔记本做笔记，有的是真记，有的只是表示自己在认真听。不要被记笔记的表象所迷惑。

来自《人民日报》的评论说，开车需要根据路况不断修正方向，传播也需要根据受众的反应进行调整。讲话的效果要看有多少老百姓在自觉地听，有多少人能自觉地把讲话化为行动。可是，又有多少人调查过讲话的传播效果？关注过讲话效果的反馈？

白居易的诗写成以后，经常读给老婆婆听，修

改到老婆婆能听懂才行。干部的讲话虽然不一定要以老婆婆听得懂的标准来修正，但是至少可以根据部分老百姓的反馈来修正，不能仅仅凭自我感觉评判讲话的好坏，更不能把自己部下的奉承当作对自己讲话的客观评价。

纵观经典的领导讲话，即使没有那么“气势恢宏”、“逻辑严密”，但总能让普通的老百姓记住几个关键词，甚至广为流传。这是因为，这些讲话对准的是普通老百姓，希望老百姓接受，所以以老百姓为直接的传播对象——语言上是老百姓的白话、形式上是群众能接受的套路、内容上包含着直截了当的思想。

总之，干部讲话应该有“百姓思维”。

（摘自2010年5月31日《中国改革报》）

莫把晦涩当高深

李醒民

在当今的学术界，有一些学人写起文章来，操起黑格尔式的晦涩腔调，摆弄海德格尔式的玄乎概念，把本来并不深奥的事理讲得诡谲莫测，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百思而不得其解，以此炫示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类人物之所以假以晦涩故作高深状，无非是欲藉此补苴罅漏，以便蒙人耳目，收取浮名虚誉。这种愚弄人的伎俩颇能迷惑一些未入或初入学门的学子、赶时髦者和随大流者。

大凡科学家（尤其是哲人科学家）和有科学素养的人，都十分重视理性思维。他们思考问题和撰写文章时，概念明晰，条理清楚，逻辑严谨，格调清朗，力图把抽象观念阐释得尽可能明了，把复杂思想说得尽可能简单。相形之下，我们的冬烘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仿佛故意与读者过不去，非把简单的事理搅和复杂不可，让你在概念的烂泥潭中迷迷糊糊，在文字的蜘蛛网中懵懵懂懂。说穿了，这只不过是缺乏科学理性和逻辑训练造成的恶果。

因此，我们要记住英国哲学科学家波普尔的告

诫：“尽量教导我们自己在讲话时总要尽可能地简单、清晰、不装腔作势，像避免鼠疫一样避免这样一种暗示，即我们拥有知识，它深奥得无法清晰、简单地表达；这才应该是我们的骄傲。”我们要像波普尔建议的那样：“人们必须训练自己用清楚简单的语言写作和讲话。对每一种思想的简洁陈述都应当尽可能清楚简单。只有下苦工夫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让今日的学子、未来的学人了解他的告诫：“提防那种广泛流传的观念，即人们上大学为的是学会如何‘给人深刻印象地’、难以理解的语言讲话和写作。当时许多学生怀着这样的目的上大学。他们不自觉地认为非常晦涩难懂的语言具有杰出的理智价值，并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点。甚至几乎没有希望会使他们明白他们是错误的，几乎没有希望会使他们认识到还有其他标准和价值观——诸如真理，寻求真理，通过批评性的消除错误来接近真理和清晰性等价值观。他们也不会发现‘给人深刻印象’而晦涩难解这一标准实际上与真理的和理性批评的标准相抵触。因为后面这些价值观依赖于清晰性。除非对它的表达充分地清晰，否则人们不能区别真理与假理，不能区别对于一个问题的适当的回答与不适当的回答，不能区别良好的观念与陈腐的观念，不能对一些观念进行批评性的评价。因此出现了对于‘给人深刻印象的’和夸大的语言的崇拜。”

（摘自2010年6月10日《社会科学报》）

领导讲话要培养 “没有准备”的功夫

赵华

笔者参加一次现场会，领导讲话时没带一片纸，直奔主题，讲了十分钟。最后，他说：“今天没有准备，讲的全是自己的平时思考，指出的是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顿时，台下掌声哗哗一片。

反观一些会议，领导在讲话时都要提前准备好讲话稿。甚至讲两分钟的话，也要让秘书准备好讲话稿。有的领导偶尔没有准备，讲话时脸憋得通红，弄得秘书干着急。

而上面这位领导“没有准备”的讲话，之所以能够赢得掌声，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说得短，简明扼要、直截了当；二是讲得实，生动具体、有啥说啥。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无论大会小会，有些领导讲起话来就是长篇大论，言之无物，充斥着套话、空话。说了上句，就知道下句。听众则听了后句，就忘了前句，不仅觉得味同嚼蜡，还让人抓不到重点。为什么有的领导讲话总喜欢长呢？这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问题。有些领导在准备发言或讲话材料时，既怕讲得少了，反映不出重视程度；又怕没有靠上形势，体现不了高度；或者没有提出新鲜说法，显示不出能力水平。受这样的“指导思想”影响，一些为领导准备发言的“笔杆子”们渐渐形成惯性思维，不论什么会议，总认为领导发言喜欢长篇大论，准备起来动辄成千上万字，洋洋洒洒，本来一句话就能够讲清楚的道理，非要用上几组排比才够味道；一张纸就能表述清楚的内容，不整上七八页就体现不出分量。相比之下，没有经过“精心准备”的发言，出自领导的亲力亲为，多了一些真实思考，少了那些空话套话，反而能够更加贴近实际，引起听众共鸣，获得更好的讲话效果。

当然，“没有准备”并不是信口开河，讲到哪算哪。这种“没有准备”的功力，源于平时的积累。经常深入一线，及时掌握各项工作的第一手材料，讲话中就能够多一些贴近基层的鲜活实例和打动人心的闪亮思想，既亲切自然又具有指导作用。如电视剧《亮剑》中的主人公李云龙，他的讲话受战士喜爱，不仅因为他的语言彰显着个人魅力，更因为他的讲话中找不到官腔，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事理和具体细致的工作分析，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让人口服心服，记忆深刻。

笔者认为，“没有准备”其实是有准备，是平时的思考和积累，是平时的练习和做足功课。

（摘自2010年6月7日《中国人事报》）

人类离火星还有多远

吴戈

“火星-500”

考验宇航员承受力

“火星-500”是由俄罗斯组织多国参与的项目。由6名志愿者在地面密闭试验舱内模拟往返火星的飞行，试验共分3个阶段：250天从地球飞往火星的虚拟飞行；30天火星地表停留；240天返程。总共持续520天。由于从飞船发射、飞向火星、火星着陆到返回地球的一系列过程，需要500多天，因此该试验项目被称为“火星-500”。

这个项目主要由俄宇航局出资，俄生物医学研究所负责组织大量试验。欧洲宇航局科学家麦克·赫普纳称，该项目主要检验人在探测外空活动中的长期承受能力，以及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宇航员之间的相互协调能力，同时了解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

中方参试项目负责人李莹辉对国内媒体介绍，“火星-500”的主要任务是，了解长期密闭环境下乘组人员的健康状态及工作能力状况，特别是获取超长飞行时间、资源有限、无法实施身体及心理特殊治疗等条件下的相关数据。这样漫长的过程对人类的耐受能力提出挑战。同时，整个试验所需资源要求一次装备到位，中间不再补给。这无疑对长期飞行所需的运载配给能力提出了考验，比如食品要求保质期两年以上等。

与俄罗斯模拟登火星不同，已成功实现载人登月的美国人提出要实际登陆火星。据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报道，在奥巴马4月15日公布的太空计划中，希望2015年设计出新的重型运载火箭，在2025年首次载人飞往月球之外的更深太空，并实现首次载人登陆小行星，到2030年左右载人绕火星飞行并返回。“随后将是载人登陆火星，希望能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奥巴马说。

飞抵火星

要在轨组装庞大飞船

早在2004年8月，欧洲航天局就公布了《火星

载人任务：全面架构评估》报告。这份报告称，一次载人火星任务需要先运送1357吨（首次需要1541吨）物资到低地球轨道，其中1083吨是燃料，其他则为宇航员所需的补给等。这需要俄“能源”重型火箭发射21次，每两个月发射一次。在地球轨道上组装完巨大的火星飞船就要4.6年，工作量相当于平均每年建设1.5个完整的国际空间站。

这还只够6名宇航员到达火星轨道，其中登陆的3人可停留火星表面约30天，有两周时间可出舱7次，但只能勘测5公里以内范围。如果事先向火星运送基础设施和补给，或者就地利用资源，一次性运输任务虽有所减轻，但整体工作量和难度会更大。比如事先安排货运任务，就会反过来要求登陆飞船高精度着陆，才能找到事先降落的物资。

飞船前往火星的转移轨道需要7个月，在火星附近停留18个月，返回需要7个月，一共两年零8个月。为了使在火星上停留的时间最长，从低地球轨道出发的合理时间是2033年4月，返回地球以2035年11月为宜。这也是奥巴马以本世纪30年代为初步目标的依据之一。

宇航员

得不到外界帮助

不止于此，火星距离遥远，宇航员通过无线电波与地球完成一句对话需要45分钟，这使同步指挥火星之旅成为难题。同时，宇航员还要远离地球家园，在狭小的飞船内禁锢近两年，他们的任何错误和失去联系都会是致命的，但宇航员们除了自己和带去的设备，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求助。

美国航空航天总署对宇航员心理压力的后果已经有所领教。1973年，几名宇航员在“天空实验室”空间站上执行3个月的任务。因为感到工作过重，又得不到支援，他们罢工了整整一天，经过激烈的争吵才消除误会。

从2002年起，美国航空航天总署在犹他州沙漠和澳大利亚南部内陆建造的火星模拟站，就开始

中 医 调 理 知 多 少

赖文志

女性最需要调理

中医调理就是调节、理疗，即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中医治疗手段，让身体重新回到健康的状态。中医调理主要包括吃中药、针灸、推拿、拔罐等方式。

并不是只有健康状况出现问题的人才需要调理，任何人只要有健康保健的需求都可以借助中医方式得到适当的调理。

不同的人只要通过适当适证的调理方式皆可以获得满意的效果。举例而言，一个平常容易疲倦、发困、懒言、食欲不好，甚至出现心悸头晕、四肢无力、脸色苍白的人，以中医辨证而言是属于气虚血弱的证型。这类人通过吃补气补血的中药，即可得到满意的效果。

女性的生理结构与特点不同于男性，经乳胎产是其主要生理特点，正由于这些生理特点，所以女性终其一生都需要调理。女性的这些生理过程中，会造成气血的散失，所以藉由中医调理，可使女性能在周期性的过程中，得到良好的身体照顾。

女性调理主要涉及气血与五脏的调理，以女性每个月的月经周期而言，由于其有周期性，所以中医调理要注意其周期的变化，以一个月分成四个阶段，进行调理，中医称之为月经周期疗法，按照其一个月的生理变化而给予特别的调理。

以多年的妇科临床调理经验而言，本人在指导调理时，特别注重月经过后的调理，对于月经来后而造成的气血亏虚，给予调补肝脾肾三经及气血。通常女性只要持之以恒，在三至六个月中体质都可以获得良好的改善。而在调理中最需注意的就是遵守医嘱，每个月坚持认真地进行调理，就可达到满意的疗效。

药膳有适宜人群

将中医的理论运用到食物上，可以实现身体状况的调整，获取健康。药膳食疗无疑是中医调理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生活中很容易办到的。对于老百姓而言，药膳食疗的科学性必须要保证。人们需要对于食物与药物结合的“性”了解清楚，而其属

观察志愿者的表现，结果发现长期封闭环境下的人际关系颇为微妙。2003年在犹他州站，外出勘察的两组宇航员同时回到住舱，但第一组却不顾第二组有人头盔损坏，坚持要先进舱。显然，如果在火星上，这意味着同伴会有生命危险。

火星之旅所受辐射 等于地上 370 年

迄今为止，人类只有 27 名参与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宇航员，曾短时间飞出过地球磁场的保护之外，他们受到的辐射只是地球上的 3 倍。即使是处在地球磁场保护中的国际空间站上，宇航员也必须躲避时有发生太阳耀斑引起的强辐射。科

学家估计，一名飞往火星的宇航员在飞船中呆两年多，受到的辐射会超过 13 万毫雷姆（一次 X 光胸透接受的辐射是 10 毫雷姆），相当于在地球上 370 年受的辐射。

目前，混凝土、液氮、水、富含氢的聚乙烯、主动电磁场等手段，在理论上都可以屏蔽辐射，但这些措施用在火星之旅上，要么不可行，要么就极为昂贵，携带一些干细胞用于修复身体损伤也只是想象。虽然曾 4 次乘航天飞机升空的老宇航员汤姆·琼斯说：“如果现在告诉我，因为去了火星，30 年以后会得癌症，我不认为是问题。”不过，奥巴马和他的科学顾问可不敢这么说。

（摘自 2010 年 6 月 4 日《青年参考》）

性更应该懂得区分，否则药膳食疗就无法达到预想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

科学性的药膳即是药物食物的结合可以适合人的体质，且让人的体质能得到益处。

本人在临床上最常教病人的药膳就是使用最简单的黄芪、当归、红枣、枸杞子、刺五加组合而成补气血的药膳，用来煮鸡肉、排骨皆可。对于一些容易疲倦、头晕、抵抗力不佳的人群，可以起到增强抵抗力、体力的效果。但这种药膳偏于“补”，所以一些容易上火或已上火的人群就要慎重使用。

临床上本人也常调和一些药材组成的茶包方便携带与冲泡，用来调理人体的部分机能。譬如用罗汉果、人参须、杭菊花等药材组成润喉保护咽喉的茶饮，刺五加、杭菊、红枣等组成的补气茶包，这些都是生活中简单可运用的茶点。

中医调理讲求“专业”二字

如果愿意尝试中医调理，就一定要讲求“专业”二字。从事中医问诊 20 多年了，现在越发清楚专业在中医治疗中的重要性。要想获得理想的中医调理效果，就必须到正规专业的医疗机构，接受正规的医疗服务，制订个性化的调理方案。

据了解，有不少去推拿的人并没有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请专业医生给予施诊，这其实存在很多隐患。就拿颈椎的推拿或整脊来说，因为颈椎牵涉到可能颈椎退化或颈动脉的问题，中老年人或颈椎有问题的人就应特别注意，一旦推拿整脊不当，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

另外，在中医调理当中，中药成方是现在很常见的。成方多是为一大类同症状人群配制而成。但成方并不适合每个人吃，“专业”在这里就表现为，经中医医生把脉诊断后，如果此人属于成方所针对的那一类人群，就可以开这个成方，同时还要配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如果医生不经把脉问诊就把成方开给人吃，专业性就要打个问号。必须要记住，世上没有万能的方子。

（作者为台湾景新中医医疗机构总院长）

（摘自 2010 年 6 月 17 日《参考消息》）

中国国土空间 将划分四大功能区域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6 月 1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决定取消和下放 184 项行政审批项目。

会议审议通过的《规划》在国家层面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并明确了各自的范围、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和开发原则。国家优化开发的城市化地区要率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发挥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作用；国家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要增强产业和要素集聚能力，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逐步建成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流域等农业主产区要严格保护耕地，稳定粮食生产，保障农产品供给，努力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区；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和大江大河重要水系等生态系统、关系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生态安全的国家限制开发的生态地区，要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高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建设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示范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等 1300 多处国家禁止开发的生态地区，要依法实施强制性保护，严禁各类开发活动，引导人口逐步有序转移，实现污染物零排放。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 经济刺激政策退出 取决于国内情况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表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将主要取决于国内情况。

在参加于韩国釜山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间隙，谈到中国刺激政策何时退出时，周小川表示：“有些政策是主要针对国内的，还是要主要考虑国内的情况。”

截至目前，已有以色列、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等国加息，而欧债危机的爆发又令世界经济复苏形势更加复杂。近来各方对中国加息时机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周小川5月24日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经济对话的第三场会间记者会上表示，尽管中国经济是一个非常外向型的经济，但从总体上说，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多数需要考虑的重点因素还是国内因素。国际因素也会对货币政策有所影响，但这个影响往往小于国内的因素。

针对危机救助成本的分担问题，他指出，各国已采取或正在考虑不同的救助成本分担方式，但目前并没有通用的解决方案。各国国情不同，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等具体差异，实行不同的成本分担方式。

（摘自2010年6月8日《中国信息报》王栋琳 任晓）

我国2020年前将规模化 开发核能、水能、风能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史立山最近表示，我国能源发展目标和布局将进行新的调整。

去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到2020年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真正产生影响的在于煤炭。”国网能源研究院的研究报告建议，为实现15%的目标，要实现“一

提高一控制”，“一提高”即大幅度提高核电及可再生能源开发及供应能力；“一控制”即严格控制煤炭消费和供应增长。因为核能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要转换成电能，煤炭的主要利用方式也是发电，因此这一格局影响最深的行业就是电力行业，这对未来电力行业的发展，对电源结构和电力布局的调整，都会产生较大影响。

研究报告指出，综合考虑2020年前各种非化石能源的资源、分布、厂址、技术经济性，以及开发潜力等情况，2020年前具备规模化开发潜力的非化石能源主要是核能、水能、风能。这些能源的利用方式以转化为电力为主，综合考虑这三种能源，2020年最大开发规模分别为核电8000万千瓦、水电3.5亿千瓦、风电1.7亿千瓦。

（摘自2010年6月5日《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杨泰）

卫生部拟出台“营养管理办法”

严禁错误营养信息欺骗公众

卫生部6月13日公布《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营养监测、营养教育、营养指导、营养干预等作出具体规定。

征求意见稿指出，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经常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营养宣传教育，推广《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帮助居民形成符合营养要求的饮食习惯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营养学会等单位从事营养工作的专业部门及人员应当提供科学实用、通俗易懂的营养与健康知识；鼓励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开展营养宣传教育，但应当科学、准确、严谨，严禁用错误和不实的营养信息误导和欺骗公众。

根据征求意见稿，国家建立营养监测制度，对居民膳食状况、营养改善效果以及营养相关疾病进行监测。营养监测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不同人群的食物摄入、膳食结构变化状况；宏量营养素、微量营养素的营养状况；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贫血、钙缺乏、维生素A缺乏等状况；超重、肥胖及营养相关疾病状况等。

（摘自2010年6月15日《健康报》记者 周婷玉）

各省已公布援疆资金

北京：72亿
天津：已援助5.4亿
山西：今年2000万
江苏：已援助近14亿
浙江：将援建项目涉及金额245亿
江西：10亿
河南：2600万
河北：18亿
吉林：今年6000万
黑龙江：今年6000万
湖南：已援助200万
辽宁：今年1.7亿
福建：已落实5亿
广东：96亿

注：各省援疆资金，除注明外，皆系5年计划投入金额。

（摘自2010年5月27日《南方周末》）

全球和平指数新西兰第一

纪双城

英国《经济学家》8日公布了2010年“全球和平指数”，新西兰再次位居榜首，伊拉克则连续4年垫底，中国位列第80位。分析认为，全球金融危机让地区间冲突以及犯罪问题进一步升级，种种暴力活动造成全球每年经济损失达7万亿美元。

“全球和平指数”项目通过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旗下的调查部门，以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根据涉外争端、国内杀人案件数量、恐怖袭击的危险程度、人权保护水平以及军费开支等23个项目进行量化排序，从2007年起每年发布一次。

在今年的排名中，新西兰已连续第二年位居“最和平”的国家了。而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主要是冰岛、奥地利以及挪威等欧洲国家。亚洲国家当中，只有日本进入前10名，排名第三。除伊拉克排名倒数第一外，排名在后面的仍然是国内战乱不断的国家，像苏丹列第146位、阿富汗列第147位，索马里列第148位。

路透社称，美国2010年的得分虽有所改善，但其排名却因上榜国家的增多和重武器数量的重新评级而下滑了三位，至第85位。亚洲国家中，除日本外，排名较靠前的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中国排名第80位，印度排名第129位。朝鲜在亚洲国家中排名最靠后，位列第139位。

（摘自2010年6月9日《环球时报》）

海有多深 洋有多大？

科学家公布最新测量数值

据美国《生活科学》网站5月19日报道，科学家利用卫星测量技术，为上述两个问题提供了答案——3682.2米的平均深度和13.32亿立方千米的总容积。

首先，在深度方面，最新数据比此前的数值少大约21到51米。有趣的是，这个通过现代高科技手段获得的数值，竟然只比一个若干世纪前的测量结果少1.2个百分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测量方法的高度精确性。

史密斯还说，卫星技术表明海底“比人们想象的要崎岖，海底山脉的数量也超乎预期”。不过，卫星并不能“看到”海底，而是通过测量海洋的表面获悉海底的情况。比如，如果海底有山脉，那么海水表面就会凸起。

据悉，此次卫星技术几乎覆盖了世界上的所有海洋，除了北极部分冰冻地区以外。对于这组最新数据，史密斯将它描述为海洋的“全新世界地图”，“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海洋的形状和容积”。

（摘自2010年5月23日《中国青年报》文/王菁）

中国的10大原油来源国

马妍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3月，中国共计进口原油2106.3万吨，环比增长13.77%，同比增长28.89%。

3月份中国10大原油来源国分别为：安哥拉，457.06万吨，同比增长98.63%；沙特，321.7万吨，同比增长29.17%；伊朗，222万吨，同比增长14.74%；俄罗斯，162.2万吨，同比增长19.1%；利比亚，144.1万吨，同比增长984.58%；阿曼，122万吨，同比下降4.72%；苏丹，101.8万吨，同比下降0.36%；伊拉克，94.7万吨，同比增长73.49%；科威特，94.5万吨，同比增长26.38%；哈萨克斯坦，91.9万吨，同比增长151.61%。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安哥拉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

总体来看，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原油总量，正呈现迅速增长态势。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石油需求量逐年稳步递增，在国内石油资源增产放缓的情况下，未来我国的石油进口量将继续增加。

（摘自2010年5月24日《环球时报》）

风 景 (外一章)

丁飞龙

风景由一些沉默着的东西组成，如山、如树、如路、如云。风景由一些喧哗着的东西组成，如瀑布、如鸟、如海、如雨。

一片叶子，既可以是风景的组成，又可以是独立的风景。因为她的纹理清晰，而寓意又显得深刻；因为她的翠绿欲滴，而又显得生机勃勃。

炊烟是故乡的一抹风景。冰雪是冬季的一道风景。月色是心里的一片风景。炊烟撩动了乡情，冰雪覆盖了浮躁，月色深沉了思绪。风景是沉静的诗。

瀑布是大山的景致。海潮是天地间的景致。鸟儿是丛林的景致。瀑布荡涤着胸襟，海潮席卷着惆怅，鸟鸣牵动着梦幻。风景是有声的画。

远行，一路的旅途，由风景联成，枝枝叶叶，山山水水，才充满情趣。

干渴的沙漠是风景。秃顶的荒山是风景。荒凉可以成为风景的矿藏。精彩的心情，是最好的挖掘机。

把握不了时间的脚步，但可以抓住欣赏岁月的契机。岁月是风景的化妆师，风景又是岁月的代言人。

美丽，是由欣赏而生的。这是风景所赐予的感悟。

夕 阳

红得如同火焰燃烧里的破核，映得西天光彩夺目。记得你东升时的模样，我顶着你的初照，用目光抚摸着晶莹的露珠和微启的花唇，我的心感受着清新和充实。

我想露珠将在你的照耀下，化为绿里的一抹，花里的一瓣，从而使绿叶的手掌托起奉献的誓言，花朵的脸庞溢满孕育的欢欣。你使所有的出发，押上激情的韵脚；你使所有的旅途，凸显生命的风景。

走过了早晨，走过了中午，走到了黄昏。许多瞬间有了定格的意味，于是你在无际的帷幕旁，泼洒出惊人的华丽。你的巨光，为所有的云朵，镶上五彩；你的凝视，让所有的眼睛，懂得了擦拭。你将走远，越过梦的境地，在浓黑的沉静或星光的喧嚣里打坐。然后，让山峦理一理身上所有的根系；让海波蕴蓄成明早的初潮。